

#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59

2011年12月27日

\*\*\*\*\*

## 如何理解馬克思、恩格斯論著中的 “民族”和“民族主義”

馬戎<sup>1</sup>

馬克思（1818~1883年）和恩格斯（1820~1895年）所生活的年代是社會動蕩的19世紀，他們在世時面對的現實社會問題是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他們的主要分析對象是西歐的英、法、德這幾個資本主義工業化相對發達、社會結構性質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階段的國家，<sup>2</sup> 他們畢生研究的主要問題是探討哲學原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制、經濟活動的基礎機制和人類社會政治結構的未來走向。我們學習、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時，必須把他們的

---

<sup>1</sup> 本文參閱了西南民族大學陳玉屏教授惠贈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及其中國化問題的認識與思考〉（研究報告），特此致謝。

<sup>2</sup> 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如《德意志意識形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法蘭西內戰》、《資本論》等論著中主要討論分析的地區，也是他們兩人長期生活和熟悉的地區。

視野和觀點放到這樣一個歷史背景當中來理解。處在當時的社會場景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階級分野在階級社會中是最根本和最核心的社會身份，階級鬥爭作為最根本和最核心的社會矛盾，遠比各國資產階級提倡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更為重要。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儘管世界上仍有部分地區社會發展緩慢並滯留在封建社會甚至傳統部族社會，但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滲透擴張到地球上所有地區並正在改變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人類社會整體已經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地球上的所有地區已經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密切關聯，牽一髮而動全局。<sup>3</sup> 與此同時，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已經發展成為 19 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潮流。

“民族”理論和“民族主義運動”本身即是在西歐工業化初期由反對封建專制王權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發明並倡導的，其起源與西歐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有著密切聯繫。<sup>4</sup> 共產主義是一個剛剛誕生但很快就在各國被剝削被壓迫階級中產生極大共鳴的意識形態體系，並迅速成為擁有一定民衆基礎的社會政治運動。19 世紀是世界無產階級（主要是歐洲無產階級）在共產國際組織的影響和領導下發動起義努力推翻資本統治的革命年代，1848 年歐洲革命和 1871 年巴黎公社起義是這一革命大潮的代表性事件。因此，我們在思考 19 世紀各國“民族主義”運動時，無論分析的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相對充分發展的西歐各國，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尚未充分發展的東歐國家和俄國，還是完全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亞非各國，我們都必須把它們放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和國際工人運動這個大潮流裡來進行分析。

在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關著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

---

<sup>3</sup> “資產階級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場，這就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9）。

<sup>4</sup> “民族是社會發展的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列寧，1914：53）。

論他們對每個具體個案是持支持還是批判的態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始至終都站在西歐工人階級運動的立場上來分析和評價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他們的基本立場非常明確和堅定，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是我們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著述的關鍵。站在這個立場上思考問題，“階級”的重要性在共產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鬥爭實踐中必然遠遠超越“民族”，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利益必然超越各國的“民族利益”。也正是站在這樣的基本立場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族”的所有論述都是圍繞工人運動的核心利益和國際無產階級鬥爭的發展前景展開的。

自 1848 年《共產黨宣言》發表至今，世界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先後經歷了共產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等多次重組，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共產黨先後在俄國、中國和東歐、亞洲一些國家奪得政權，在約半個世紀的時期內一度形成與歐美資本主義陣營相對峙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隨後又發生了多次理論爭辯和政治分裂，最終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出現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解體和意識形態轉型。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克服了 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後，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經濟結構等方面也進行了調整和轉型，明顯緩和了內部的階級矛盾，今天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已不存在以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為目標的工人運動，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已很少被人提起，亞非拉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陸續實現獨立建國。這些事件徹底改變了 19 世紀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民族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已成為學術界和政治領袖們更為關注的熱點話題。地球政治生態在這一個多世紀中發生的重大變化，使今天的人們在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寫下的文字時，難免有滄海桑田、恍若隔世之感。

20 世紀在歐亞各地先後建立的共產黨政權，其意識形態的理論

基礎始終是馬克思主義，召開重大會議時唱《國際歌》。這些國家在思考和處理本國的民族問題時，雖然根據本國國情做出不同解讀和決策，但仍舊援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甚至斯大林的有關論述作為理論基礎。<sup>5</sup> 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共產黨執政國家的解體，都是以“民族”為分界實施的，中國一些地區也存在民族分裂的威脅，這些現實問題使得我們很有必要重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著述，同時系統地反思各共產黨國家在民族問題上的歷史實踐，努力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梳理出一個脈絡，從而為我們思考今天中國的民族問題提供理論框架和分析思路。在這一學習和思考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解放思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科學態度來反對堅持“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通過學術討論和實證分析逐步認識和理解國內外民族問題和民族關係演變的客觀規律。

本文希望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有關著述的解讀對他們在不同時期、不同議題上與民族問題相聯繫的觀點進行一個粗略的梳理。有些西方學者如研究馬列主義民族理論的美國學者康納(Walker Connor)等曾經結合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史對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論有比較系統的評議與分析，他們提出的一些思路可能有助於我們解讀在19世紀國際形勢下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本文試圖在馬克思、恩格斯著述和後人評議的基礎上進行某種綜合性的理論探索，並探討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民族問題的論述對我們今天理解中國和世界上的民族問題能夠提供怎樣的啟示。

## 一、階級與民族之間的關係

---

<sup>5</sup> “由於他（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上的貢獻和鉅大影響，民族理論界一般仍將他作為‘經典作家’看待”（王希恩，2001：16）。

## 1、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階級鬥爭是歷史前進的主線

在分析 19 世紀歐洲社會的政治鬥爭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關注點是如何啟發各國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發動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去共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新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分析當時國際社會革命的基本邏輯：

(1) “至今所有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2) “現今的這個時代，即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就是它使階級矛盾簡單化了：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即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3)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純樸的關係統統破壞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都捲入文明的漩渦裡了。……它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4) 但是隨著資本的發展和階級矛盾的激化，“資產階級再也不能統治下去了，……(現時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5, 466, 468, 470, 478)。因此，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主線，而 19 世紀人類社會的核心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

那麼，在“階級”和“民族”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明確地指出：“現代的工業勞動，現代的資本壓迫，無論是在英國或法國，也無論是在美國或德國，都是一樣的，都已經使無產階級失去任何民族性了。……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特別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77, 479)。作為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對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追求必然超越“民族”的利益訴求，必須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作為自己的旗幟。針對一些人批評共產黨人主張“廢除祖國、廢除民族”的指責，馬恩坦承“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原來沒有的東西。既然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

上昇為民族的（主導）階級，確立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不過這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個意思。……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87~488）。<sup>6</sup> 這句話可以被解讀為：現實中的工人起義和奪權鬥爭，只能在各國內部發起和推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將主導本民族（國家）的政治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標是在全世界消滅資產階級統治和一切剝削制度，而在無產階級在全世界取得勝利之前，這個無產階級主導的“民族”（國家）的存在只能是“暫時的”。這裡已經隱含著“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的命題。但是在1848年《宣言》發表的年代，無產階級究竟應當如何組織和開展武裝起義？在一國取得勝利後將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政權？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旗幟下這一新生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如何把共產主義推向全世界？當時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只能是模糊不清的。<sup>7</sup> 所以，無產階級取得政治統治後所確立的“民族”（國家），<sup>8</sup> 儘管只是“暫時的”，它與“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個意思”之間的本質區別究竟是什麼？《共產黨宣言》對此的表述並不十分清楚。

美國學者康納（Walker Connor）在他的《馬列主義理論和戰略中的民族問題》（*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年）一書中把共產主義和

---

<sup>6</sup> 這段重要論述的英文版為“The working men have no country. We cannot take from them what they have not got. Since the proletariat must first of all acquire political supremacy, must rise to be the leading class of the nation, must constitute itself the nation, it is, so far, itself national, though not in the bourgeois sense of the word”（Tucker, 1978：488）。

<sup>7</sup>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後建立的政權是個什麼結構和運行機制，馬克思只是在觀察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實踐後才提出一些較為具體的觀點（參見《法蘭西內戰》）。

<sup>8</sup> 康納指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中，有時“nation”（民族）和“state”（國家）是不加區分的，有時“nation”（民族）指一個國家內部包括所有族群的全體人口（Connor, 1985：9）。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進行比較(表~1)。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念,階級鬥爭是最核心、最本質的社會矛盾,因此各國社會內部的階級界限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該表的左側部分,德國、英國、法國三國的資產階級屬於一個陣線,三國的無產階級屬於另一陣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界限是黑粗的實線,國家之間是虛線。而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觀念中,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是最重要和最基礎的認同邊界,所以在該表的右側,德國、英國、法國三國之間的界限是黑粗的實線,各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是虛線。民族和“民族國家”是各國國民(無論貧富)最核心、最本質的認同單元和效忠對象。一邊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邊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兩者基本立場針鋒相對。康納的說明可作為《共產黨宣言》中“民族”論述的一個註腳。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既存在各國內部的階級區隔也存在民族國家之間的民族區隔,表~1 突出了兩種“民族觀”在群體認同基本取向上的差異。由於各民族內部都存在著所有制(生產資料佔有)和財富分配方面利益不同的多個階級,各民族國家之間又存在著“民族”利益(自然資源、市場、財富等)的衝突,那麼,“階級”立場和“民族”角色這兩者之間在實際社會運行中是一種什麼互動關係?是前者決定後者,還是後者決定前者?還是兩者相互影響?

表~1：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比較

馬克思主義民族觀			民族主義民族觀		
(德意志) 資產階級	(英吉利) 資產階級	(法蘭西) 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 德意志	(資產階級) 英吉利	(資產階級) 法蘭西
無產階級 (德意志)	無產階級 (英吉利)	無產階級 (法蘭西)	(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

來源：Connor, 1985：1。

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可以說在一般情況下是前者決定後者。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影響民族政

治立場的主要因素。首先，沒有進入或沒有充分進入資產階級社會發展階段的民族，必然在政治上帶有傳統封建社會的政治理念和傾向，所以難以理解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進步意義，在國際政治衝突中通常站在反動勢力一邊。這是在社會基本性質的宏觀層面上的決定因素。其次，對於已經開始進入資產階級社會階段的民族，社會和民族內部同時存在著向前發展和向後倒退的兩股政治勢力，各政黨的組織力量、成熟程度（包括受到外部勢力的影響）以及由哪個政治集團主導本民族在國際政治衝突中的政治態度，決定了所在民族的政治立場。這是在社會組織和政治結構的中觀層面上的決定因素。第三，在各政黨內部，領袖人物的知識結構、政治閱歷和行為個性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領導的政黨，從而通過政黨的活動影響民族在國際政治衝突中的政治取向，這是政治領袖個人在微觀層面上對政治鬥爭的影響因素。<sup>9</sup> 處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同階段的各個國家，各自三個層面的影響因素及其各自發揮的作用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面，並在各國互動的過程中彼此交織在一起，使人們對“民族”因素和“階級”因素各自作用的分析變得極為困難。

## 2、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維持統治的工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儘管“民族”因素和“階級”因素的交織作用很難梳理，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工人階級和國際工人運動的立場上，始終明確地把“階級”因素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也反映出當他們在思考“民族”問題時，主要考慮的是其經濟結構（是否發展進入資本主義）和政治功能（反對還是支持國際工人運動），對於“民族”認同中的文化因素和感情心理因素則很少考慮。

在當時西歐各國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的革命年代（1830年巴黎起

---

<sup>9</sup> 在這方面論述最精闢的是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三聯書店1965年第2版）。



義、1831 和 1834 年里昂起義、1842~1847 年英國憲章運動、1848 年 6 月巴黎起義、1848 年 9 月法蘭克福起義、1871 年 3 月巴黎公社起義等），一個重要的政治現象就是各國資產階級都在極力鼓吹和煽動本國民族主義情緒和“民族”團結，以便對內鞏固其統治政權，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在 19 世紀的歐洲各國，“民族主義”已經失去此前在資本主義共和體制取代封建割據王朝的歷史階段中所具有的任何進步意義，徹頭徹尾地淪為各國資產階級壓迫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工具和用以瓦解、破壞工人運動的思想侵蝕劑。所以，在當時激烈的政治鬥爭形勢下，批判資產階級鼓吹的“民族主義”便成為工人運動的重要理論鬥爭。

馬克思指出，在歐洲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統治、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政治大格局下，任何“民族主義”的宣傳都成為分化和破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手段，因此任何“民族領袖”也必然是偽善和反動的政治人物。“階級的統治已經不能拿民族的外衣來掩蓋了”（馬克思，1871b：383）。“各國的資產階級雖然在世界市場上互相衝突競爭，但總是聯合起來反對各國的無產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1847：409）。馬克思尖銳地指出，“民族主義”在基本性質上已經徹底淪為反動派維護其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舊社會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統治階級只有靠民族鬥爭和民族矛盾才能繼續執掌政權和剝削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民群眾”（馬克思，1871a：316）。“自古以來，一切統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進行活動的目的可以歸結為一點：為了延長專制政權的壽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殘殺，利用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恩格斯，1848a：177）。

在 19 世紀西歐各國無產階級不斷發動起義和資產階級對革命持續殘酷鎮壓的過程中，資產階級總是打著“民族利益”（民族的生存、發展和榮耀）的旗幟，通過強調各民族內部享有的共同語言、宗教、族源、歷史等當年構建“民族”的文化和血緣要素，在感情上極力煽

動本族民衆和工人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引導人們把“民族矛盾”看得重於“階級矛盾”，號召本民族所有成員（包括貴族、資本家、商人和普通勞動群衆）團結起來，為了“具有共同祖先、共同文化、共同宗教傳統的偉大民族的榮耀和利益”堅決地去與周邊其他“民族”（包括貴族、資本家、商人和普通勞動群衆）進行對抗甚至戰爭，這樣的政治動員可以有效地通過挑動民族仇恨來分化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國際聯合。

馬克思多次呼籲，面對各國資產階級的這一鬥爭策略，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必須針鋒相對地、堅決地揭穿資產階級的“民族”神話。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運動風起雲湧的革命年代，“民族”和“民族主義運動”已經淪為資產階級反動派的統治工具，因此必須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應當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聯盟來對抗各民族的資產階級兄弟聯盟”（馬克思和恩格斯，1847：412），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作為自己的戰鬥旗幟，只有把分散在各國的工人階級隊伍組織和團結起來，無產階級才有可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取得革命的勝利。而對於各國資產階級用以鼓吹“民族主義”的工具即本民族成員共享的那些文化和血緣要素，馬克思必然要放在次要和從屬的位置加以淡化。既然“民族利益”必須從屬於“階級鬥爭”，那麼“文化”也只能從屬於“政治”。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民族”的角色和命運將會如何？《共產黨宣言》提出：“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逝下去。無產階級的統治將更加快它們的消逝”（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87~488）。這段話中的“民族孤立性”在1972年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被譯為“民族隔絕”（第270頁），而在英文版中是“national

differences”（民族差異）。<sup>10</sup> 康納對這句話的解讀就是馬恩認為所有的民族差異將要消逝，共產黨政權會使這一進程加快速度，同時他指出，正是在如何理解這一觀點上，各共產黨政權在處理國內民族問題時將要必然面對一個爭論不決的選擇：是應當容忍民族文化多樣性還是積極鼓勵同化（Connor, 1985: 8）。

### 3、“nation”和“nationality”

我國學者在討論“民族”定義時，有時論及漢文“民族”一詞的英譯即“nation”和“nationality”的區別。恩格斯在討論路易·波拿巴的外交政策時，特別分析了他提出的“民族原則”這個概念，在論述中也涉及“nation”和“nationality”這兩個概念的區別。這些論述應當引起我國學者的關注。

路易·拿破侖，……為自己的對外政策發明一種民主化了的、通俗的名稱。於是就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民族原則”——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好呢？每一個民族（nationalities）都應當是自己命運的主宰；任何一個民族（nationalities）的每一個單獨部分都應當被允許與自己的偉大祖國合併，——還有什麼比這更自由主義呢？不過，請注意，——現在說的已經不是nations，而是nationalities了。

歐洲沒有一個國家不是一個政府管轄好幾個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蘇格蘭山區的克爾特人和威爾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來說，無疑地有別於英格蘭人，然而，誰也不把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的殘餘叫做民族，同樣，誰也不會把法國布列塔尼的克爾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沒有一條國家分界線是

---

<sup>10</sup> 這段話的英文版為“National differences and antagonism between peoples are daily more and more vanishing, ow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urgeoisie, to freedom of commerce, to the world-market, to uniformity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corresponding thereto. The supremacy of the proletariat will cause them to vanish still faster”（Tucker, 1978: 488）。國內的中譯本大多是從俄文版翻譯的，究竟哪個譯本更忠實於馬恩原文的德文版，尚需考證。

與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線,即語言的分界線相吻合的。……而這種情況最終會帶來不小的好處：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異族成分，這些異族成分與它們的鄰人建立聯繫，使過於單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樣性（恩格斯，1866：175~176）。

起源於西歐資本主義萌發時期的“民族”理念和“民族主義”運動，其主要精神就是以“民族”為單元建立“民族國家”，<sup>11</sup> 以此取代傳統世襲封建貴族王權國家，提出“每個民族都有權建立獨立國家”（one nation, one state）。從恩格斯上面這段論述來看，他把歐洲的群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建立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民族（nation，雖然中譯版中沒有註出英文），另一類是位於各民族國家內部的“nationalities”，恩格斯雖然也稱它們是“民族”，但是以“nationality”這個名詞與“nation”相區分，而且稱它們是“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的殘餘”，“誰也不把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的殘餘叫做民族”。“people”是歷史上的群體稱謂，到了近代，“people”演變為在國家框架中居於兩個層面的“民族”群體即“nation”和“nationality”。從這裡我們看到蘇聯經典著作編譯局把斯大林民族理論譯成英文時，使用“nationality”來指稱俄國內部各“民族”，是有一定根據和出處的。恩格斯明確指出，被稱為“nationality”的“民族”不必“享有獨立的政治生存權利”，而且“沒有一條國家分界線是與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線，即語言的分界線相吻合的”。今天我們在使用這些英語詞彙時，必需考慮目前國際通用的理解。“nationality”現在一般被解讀為“國籍”，<sup>12</sup>

---

<sup>11</sup> “民族主義認為人類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須是政治組織的嚴格單位。……除非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國家，享有獨立存在的地位，否則人類不會獲得任何美好的處境”；“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離的自然實體，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獲得是當每一個民族形成了獨立的國家的時候”（凱杜里，2002：7~8，52）。

<sup>12</sup> “中華民族是個 nationality，但是哈尼族、毛南族等他們不是一個 nationality”（郝

所以繼續使用“nationality”來稱呼我國國內各少數族群是不適宜的。

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中有一條是“共同語言”，恩格斯這段話講到“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線，即語言的分界線”。這裡可以看到二者的共性，也說明在現代國家出現多種語言的狀況是十分自然的。恩格斯進一步認為，這種語言格局帶來的“文化多樣性”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相互交往中有助於與鄰國的交往，“會帶來不小的好處”。費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國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費孝通，1989）以及美國 20 世紀後半葉倡導的“文化多元主義”（Gordon, 1964：132~133），在基礎思路上與恩格斯都有相通之處。

恩格斯對路易·波拿巴的“民族原則”進行了批判。路易·波拿巴究竟錯在哪裡了呢？

民族原則提出了這樣兩類問題：第一是關於這些歷史上大的民族（peoples）之間的分界線問題；第二是關於一些民族（peoples）的為數眾多的細小殘餘的民族獨立生存權利的問題，這些民族（peoples）在歷史舞臺上曾經或長或短地存在過一個時期，但後來卻成爲某一個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難的較強大的民族的組成部分。一個民族（people）在歐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從民族原則的觀點看來，是算不了什麼的；在它看來，從來沒有歷史、也沒有創造歷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幾亞的羅馬尼亞人，同具有兩千年歷史並具有堅韌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義；威爾士人和曼恩島居民，只要他們願意，它們就能像英格蘭人一樣地享有獨立的政治生存權利，而似乎這不是什麼荒謬的看法。但所有這些都是絕頂荒謬的，它被套上一種通俗的形式，好用來迷惑輕信者；……民族原則決不是波拿巴主義者爲了恢復波蘭所搞出來的發明，而只是俄國人爲了滅亡波蘭所臆造出來的發明（恩

---

瑞，2010）。

格斯，1866：176~177）。

所以，路易·波拿巴的“民族原則”的荒謬就在於他完全無視各民族之間在“生命力”方面的比較，把一些“從來沒有歷史、也沒有創造歷史所必需的精力的”民族與“具有兩千年歷史並具有堅韌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民族放在同等的地位。在這段話中，恩格斯一如既往明確地把民族分為“有生命力的”和“缺乏生命力的”兩組，後者不應當享有與前者同樣的“獨立的政治生存權利”。認為兩者具有“同等重要意義”和同等“獨立的政治生存權利”的“民族原則”，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的，在政治上是服務於反動的沙皇專制統治的。在這裡，我們幾乎完全看不到今天人們普遍接受的“民族平等”的原則。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對那些“沒有生命力”、競爭失敗並淪為“反動民族”的群體，應當“實行最堅決的恐怖主義”（恩格斯，1849b：342）。到了1913年，列寧在討論俄國國內的民族問題才明確提出“民族平等”的提法，<sup>13</sup>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轉折。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的立場和觀點與後來斯大林奠定的蘇聯民族理論之間具有原則性的差別。今天的人們完全可以不同意恩格斯的觀點，甚至有些人可能會斥之為“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宣傳以及對弱勢民族文明傳統和生存權利的漠視。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今天在討論民族問題時絕對不應當迴避恩格斯的這些觀點，而且應當認真地思考他所堅持的這些觀點背後的道理。

在19世紀歐洲大革命的形勢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注點是社會制度形態的歷史發展大潮流，以及各民族在革命鬥爭中如何“站隊”的政治立場，因為正是這些民族在歐洲革命戰爭中的“站隊”將

---

<sup>13</sup> “我們要求國內各民族絕對平等，並無條件地保護一切少數民族的權利”（列寧，1913：100）。

決定歐洲革命能否成功的歷史命運。相比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各民族的文化特徵和傳統（包括語言、宗教、觀念、習俗等）和民族之間的平等權利就不那麼重視，而且認為“先進民族”對“沒有生命力民族”的同化是歷史的進步。儘管今天人類學家們對世界各地少數群體“原生態”的文化是如何地欣賞和痴迷，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眼裡，這些傳統文化必然會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逐步消失，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把一些群體頑強地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看作是“保守”和“反動”的表現。

#### 4、康納對馬克思、恩格斯民族論述的分析

康納把“經典馬克思主義”（classic Marxism）的民族理論歸納出七條基本內容：（1）民族（nation）及其意識形態（nationalism）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是資產階級時代的產物；（2）因此民族主義（也許所有民族特性）只是短暫的社會現象，不可能超越資本主義階段；（3）民族主義可能是進步的力量或者是反革命的力量，對於任何社會來說，（進行判斷的）分水嶺就在於（該國）是否存在著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4）不論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民族主義在任何地區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用它來轉移無產階級的視線，防止無產階級去認識並實現自己的階級意識和利益；（5）但是這一策略不會奏效，因為忠誠度（loyalties）是由經濟現實而不是族群~民族情感（ethnonational sentiments）決定的；（6）共產主義者可以支持任何運動，包括民族主義或其他運動，只要這一運動代表著最進步的選擇；（7）但是共產主義者必須保持自己（的奮鬥目標）超越在民族主義之上，這一“免疫性”（immunity）是共產主義者所惟有的特徵（Connor, 1985：10~11）。

他隨後又補充了兩點：（8）通過對“自決權利”這一抽象原則表示公開贊同，從而與民族激情（national aspirations）進行外表上的結盟（ostensible alignment），這是一個不錯的策略。但是在非抽象

層面，對於一個具體的民族運動是否給予支持，必須在個案的基礎上做出決定；（9）在決定是否（對一個民族主義運動）給予支持時，最終要進行考量的並不是這個具體運動的相對進步性，而是這一運動與國際（工人）運動整體的更加深遠的需求之間的關係（Connor, 1985：14）。

從康納歸納的以上九點來看，有幾個地方是可以進行討論的。“民族主義（也許所有民族特性）只是短暫的社會現象，不可能超越資本主義階段”，這一觀點把民族主義在資本主義之前積累的文化基礎以及民族主義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對領導集團和民衆的影響力估計過低。“不論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民族主義在任何地區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句話也講得絕對了，例如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民族主義就不能說成只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儘管我們可以質疑康納的歸納是否準確，但是馬恩似乎確實把民族主義在不同歷史和國家場景中的作用看得過於簡單化並居於絕對從屬地位，對民族主義的文化根基和社會影響估計不足。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始終沒有對“民族”這個重要概念給出一個準確定義和進行系統分析，馬恩許多關於“民族”的論述都是結合當時的不同具體場景寫下的。

康納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基於對經濟因素（生產力、生產關係）的關注，把“民族”主要看作是一個“經濟單元”，把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礎看作是為經濟紐帶（economic ties），從而忽視了心理的、文化的和歷史因素的重要性，低估了可由族群認同激發出來的鉅大動力（Conner, 1985：8）。這也是後來馬克斯·韋伯強調文化和宗教因素對人類社會同樣具有重大影響的原因。康納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過高地估計了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他們同時也把民衆追求“各民族聯合”（政治合併）帶來的經濟增長積極後果的熱情估計過高，而對各國民衆（包括工人階級）的“民族熱情”嚴重估計不足。“正是這種過低的估計，使得他們誇大了人們為使自己被同化進



規模更大、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單元而放棄自己（原有）群體身份的願望。甚至在出現分裂的情形下，他們相信當熱情冷卻下來以後，自身的經濟利益將很快推動分裂主義者去尋求某種形式——可能是聯邦——的政治統一。甚至當他們的分析對象是整個民族而不是階級的時候，經濟動力和世界（工人）運動仍然是首要的力量和最重要的目標”（Connor, 1985：19）。

康納認為在 1848 年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對民族主義給予更多重視，“來自於具體事件的衝擊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民族主義的重要性給予新的關注，但這些關注主要採取的是策略考量的形式（the form of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民族自決’的口號在這方面為他們提供了工具。……馬克思使共產國際接收了所有民族群體具有自決權的原則。但是在 1866 年，……在馬克思的催促下，恩格斯公開放棄了這一原則的普遍性，把民族身份（status of nation）只限定在很少的被選定的群體”（Conner, 1985：11~12），這指的是恩格斯在〈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麼關係？〉一文中明確提出一些“沒有生命力的民族”是沒有獨立建國權利的觀點。<sup>14</sup> 在談論某些民族時，康納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使用一些“刻板的表述”（stereotypical approach）如“懶惰的墨西哥人”、“頑固的斯拉夫人”、“小貴族懶惰本性的波蘭人”等提法，這些都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思路完全不相符（Conner, 1985：15）。

以上這些討論一方面說明了馬恩在民族觀點上的演變過程，他們的理論和政治立場根據社會實踐的演變在不斷做出新的調整；另一方面說明他們都是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在討論具體的歐洲政治鬥爭時難免會對一些分析對象使用帶有感情色彩的用詞。

---

<sup>14</sup> 恩格斯在該文中實際上否認了威爾士人和曼恩島居民等群體擁有與英格蘭人同樣的獨立政治生存權利，認為這種想法“是絕頂荒謬的”，參見關於“民族原則”討論部分的引文（恩格斯，1866：177）。

康納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存在三個支系（three identifiable strains）：第一個是經典馬克思主義（classical Marxism），把階級意識視為最首要的，把階級鬥爭視為不可或缺的，因而工人運動與民族主義勢不兩立（irreconcilable）；第二個是戰略性的馬克思主義（strategic Marxism），在理論層面對民族自決權給予正式的支持，但是在現實中對具體的民族主義運動的支持具有很強的選擇性；<sup>15</sup> 第三個是“民族的馬克思主義”（national Marxism），強調民族特徵的生命力可超越時代，並把民族的角色看作歷史動力中最重要工具（Conner, 1985：20）。康納看到了馬恩關於民族的論述具有不同的側面，也注意到在不同歷史時期、針對不同的對象（理論問題還是具體事件的表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側重點各有不同，闡述基礎理論時淡化“民族”的重要性，具體談到歐洲革命形勢時又以“民族”劃分陣營。

需要指出的是，康納提出的“三支系說”在馬恩具體著述中存在相互重合的部分。例如支持某個民族主義運動可看作是戰略選擇（第二支系），但是提出的論證依據是該民族的先進作用，這即是第三支系的內容；而判斷一個民族是否“先進”，又必然要分析該民族的階級結構和社會形態，這又牽涉到第一支系。因此，在“三支系”之間並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彼此對立，也許各自反映出來的是一個理論體系的不同層面或不同的分析維度。西方學者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兼聽則明，作為一種理論歸納，康納的分析思路在學術研究層面提供了一個可供參照的觀察視角，對我們系統、全面理解馬恩的民族著述可以有所啟發。

## 二、19世紀歐洲革命大潮中的各民族

---

<sup>15</sup> “策略的重要性要更為優先於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和一致性。即使是帶有進步性質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只有當其與全球性運動的更高需求相一致時，才應當予以支持”（Conner, 1985：14）。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像斯大林那樣對什麼是“民族”提出一個清晰、明確的定義，但是他們從社會所有制演進和階級社會基本形態發展的角度，站在西歐工人階級運動的立場上，對各國“民族”的政治角色和社會作用做出許多精闢的論述。他們不僅是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而且也是 19 世紀後半葉歐洲工人運動發展戰略的指導者。

當時歐洲各國有許多帶有革命傾向並直接從事革命活動的組織，如“正義者同盟”（1847 年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主義者通信委員會”、“德國工人協會”、“民主主義者協會”和“德國共產主義者俱樂部”等。<sup>16</sup> 馬克思任主筆的《新萊茵報》“自稱為‘民主派的機關報’”，他們許多關於歐洲民族主義運動的評論文章就發表在《新萊茵報》，1850 年他們又出版了《新萊茵評論》。正是通過這些進步刊物和他們與革命組織的聯繫，馬克思和恩格斯間接地指導了 19 世紀後半葉的歐洲工人運動。

### 1、“先進民族~革命民族”和“落後民族~反革命民族”

1848~1850 年期間，歐洲各地爆發了社會革命、民衆起義和戰爭，各國政府、各民族和各政治團體在革命形勢下紛紛表示自己的立場並投入到鬥爭之中。在這個時期的著述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是否順應歷史演變軌跡”在政治上把當時世界上各“民族”（包括部族、部落等群體）大致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生命力、有創造力的、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大潮流的“先進民族”；另一類是封閉保守、沒有生命力、苟延殘喘、開歷史倒車的“落後民族”。這兩大類民族在人類社會演進史上分別扮演著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對這

---

<sup>16</sup> 1848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建立了德國共產主義者俱樂部，力勸它的會員們脫離赫爾維格的游擊隊而徒手單身回到德國去進行革命活動。他們終於派遣了幾百個工人回到德國”（梅林，1956：173）。

些民族的歷史角色進行理性分析的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那些在歐洲歷史進程中發揮反革命作用的“反動民族”時，也寫下一些帶有感情色彩的強烈抨擊。

康納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些討論中把一些“民族”整體地視作啟蒙和進步的力量，而“這一角色在以前的論述中是僅僅保留給無產階級的”，同時另一些“民族”整體則替代了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扮演著代表黑暗和反動的角色（Conner, 1985：15），這種對“民族”政治角色的強調（“革命民族”與“反動民族”）與《共產黨宣言》對“階級”政治角色的強調之間出現很大的反差。

康納的這一比較在抽象層面是有道理的，但是用抽象概念構成的基本原理必須在實際應用中受到檢驗。當時歐洲各民族內部的階級分化尚未超越民族之間的利益衝突而成為決定性因素，主要政治鬥爭的參與單元仍是各個具體的“民族”，正是這些行動單元（“民族”）在當時歐洲大革命的政治舞臺上各自扮演“進步力量”和“反動力量”的角色。19世紀歐洲的政治鬥爭，主要是圍繞各國、各民族之間展開的，各民族內部的階級鬥爭和弱小在野的無產階級尚不能主導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立場和發展方向。在這種現實形勢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歐洲形勢的分析和論述只能以“民族”在國際政治鬥爭中發揮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作為分析的主線。正如康納所說，在實際社會運動中，“是一些民族——而不是階級——在進行階級戰爭”（it is nations--not classes--that fight the class war）（Conner, 1985：15）。

“革命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其領導者必然帶有一定的無產階級性質或受到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影響，在歐洲大革命浪潮中，他們站在代表歷史發展方向（有利於國際工人運動發展）的陣營裡推動革命形勢的前進。而“反動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領導者則往往站在資產階級甚至封建領主的陣營裡“開歷史的倒車”，淪為封建統治集團和資本家集團的幫兇。各“民族主義運動”的革命性和

反動性就是這樣與其領導集團的階級性聯繫在一起，並被其領導集團的階級性所決定。

19 世紀也是西歐資產階級國家向世界各地大肆擴張和進行侵略的時代。當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水平居於先進地位的西方國家在東歐和其他大陸推行殖民主義侵略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這些侵略活動視作是“先進民族”對“落後民族”的衝擊，雖然採取的行為方式和造成的社會後果很“殘酷”和很“不道德”，但是這些侵略活動在客觀上推動了歷史進程，扮演了“歷史工具”的角色。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當傳統保守的“落後民族”抵禦“先進民族”的侵略、壓迫和剝削時，“先進民族”在進行侵略和殖民過程中充分暴露了為了牟利而不擇手段的強盜本性，“落後民族”在反抗侵略的鬥爭中反而有可能在道德上佔據上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雖然這些落後民族的悲慘境遇確實令人同情，但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大進程來看，這是“人類必需付出的代價”。以社會進步的大方向為準繩，從理性而非感情的角度來判定不同民族的“進步”和“反動”，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及歐洲及世界各國的民族和民族主義運動時始終堅持的基本思路。這一思路帶有很強的當時在科學和思想界佔據主流地位的進化論色彩，並且對民族問題的思考也是本質主義的。這一點在以下馬恩關於具體民族的論述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 2、“革命民族”與“反革命民族”之間的戰爭

在 19 世紀中葉和後期，歐洲整體上處在一個動蕩的社會革命的年代。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一文中，恩格斯對 19 世紀中葉歐洲的政治形勢和各民族的政治角色有一個整體的判斷與分析：

沉痛的經驗使人們認識到，要實現“歐洲各族人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詞和美好的意願，而必須通過徹底的革命和流血的鬥爭；問題不在於歐洲各族人民在一個共和國的旗幟下結成同盟，而在於革命的各族人們結成反對反革命民族的同盟，這種

同盟不是在紙上，而只有在戰場上才能實現。……

我們已經論證過，那些幾百年來並非出於自己的意願而被歷史拖著走的小民族，必然要成為反革命的民族，而且它們在 1848 年革命中所採取的全部立場的確都是反革命的立場。……

我們重複一遍，除了波蘭人、俄羅斯人 — 充其量還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 — 以外，沒有一個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簡單：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沒有具備為獨立和維持生命力所必需的歷史、地理、政治和工業的條件。那些從來沒有自己的歷史，從達到文明發展的最初階段即最低階段的時候起就陷於異族統治之下，或者只是由於異族的壓迫才被提高到文明發展的最初階段的民族，是沒有生命力的，是永遠也不可能獲得什麼獨立的。……

1848 年革命強迫歐洲的一切民族表明態度：是擁護這次革命，還是反對這次革命。在一個月內，已經成熟到能夠進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進行了革命，而沒有成熟到能夠進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聯合起來反對革命。……

正是因為波蘭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聯繫著，正是因為“波蘭人”和“革命者”兩個詞成了同義語，波蘭人就贏得了全歐洲的同情，保證了他們民族的復興，而捷克人、克羅地亞人和俄國人卻受到全歐洲的憎恨，整個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戰爭來反對他們（恩格斯，1849：323，327，328，337）。

恩格斯的這段話有幾層含義：首先，在當時的歐洲各國普遍爆發革命的動蕩年代，在各自領導集團（統治階級）的主導和國際形勢的逼迫下，各民族以“民族”為單元分別站在兩個彼此對立的陣營裡，一個是革命陣營，另一個是反革命陣營，它們之間的對立和衝突直接反映在政治態度和戰場上；第二，反對革命的群體是“被歷史拖著走的小民族”，“沒有具備為獨立和維持生命力所必需的歷史、地理、政治和工業的條件”，“沒有成熟到能夠進行革命”，“是沒有生命力的，是永遠也不可能獲得什麼獨立的”；第三，對於歐洲各民族中

哪個屬於革命的民族，哪個屬於反革命的民族，他也給予了具體的評價和表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主要從社會形態發展階段來評價各群體的“生命力”和獲得獨立的“資格”，並從當時歐洲革命中從屬哪一個陣營來判斷各民族的政治立場和性質，這些都充分展示了康納所說的“戰略的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在這些論述中，我們完全看不到關於各民族內部階級關係的分析。

### 3、如何判定“革命的民族”和“反革命的民族”

在“匈牙利的鬥爭”一文中，恩格斯具體分析了形成兩個陣營分野的原因：

1848年首先在奧地利造成了極可怕的混亂局面，……但是，在這種混亂局面中很快就有了頭緒。鬥爭者分成了兩大陣營：德國人、波蘭人和馬扎爾人站在革命方面，其他民族，即除了波蘭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和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薩克森人，則站在反革命方面。

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民族劃分呢？這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種劃分符合這些民族過去的全部歷史情況。這是解決所有這些大小民族生死存亡問題的開始。直到現在爲止，奧地利過去的全部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1848年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奧地利各個大小民族中，只有三個民族是進步的代表者，它們積極地影響歷史，並且現在還保持著生命力，這就是德國人、波蘭人、馬扎爾人。因此，他們現在是革命的。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將來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風暴中滅亡。因此，它們現在是反革命的（恩格斯，1849a：196~197）。

除了在當時全面鋪開的歐洲革命鬥爭中如何“站隊”之外，恩格斯在評價一個民族是否是“進步的代表者”時提出了三個標準，第一個是“保持著生命力”，特別是在社會制度和科技經濟方面的創新能力，第二個是“具有同化異族的能力”，第三個是“積極地影響歷

史”。當然，這三者之間相互密切關聯。在文化創新、科技探索和社會組織、經濟發展方面具有強大主動性和生命力的群體，在與周邊其他群體交往中，由於居於領先地位而積極影響和引領著周邊群體的發展，成為“進步的代表者”，其自身的發展和它在該地域社會、經濟、文化發展進程中發揮的“領導作用”，自然會積極地影響整個地域的歷史進程。

恩格斯認為馬扎爾人具有生命力和很強的同化異族的能力，甚至同化了進入匈牙利的德國人：“匈牙利的德國人儘管仍然保持著德國的語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習俗方面，都成為地道的馬扎爾人了。只有新遷去的農民移民、猶太人和特蘭西瓦尼亞的薩克森人是例外，他們堅持在異國保留他們那種不必要的民族特性”（恩格斯，1849a：200）。與之相比較，那些在這一進步過程中抗拒“同化”、努力“保留他們那種不必要的民族特性”的群體，則被恩格斯認為是社會進步過程中的“反動的民族”。

這些觀點以當代“文化相對論”的立場來看，是很難接受的。恩格斯在這些論述中，實際上認定了在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間存在著“進步”和“反動”的性質差異，儘管“古往今來每個民族都在某些方面優越於其他民族”（馬克思和恩格斯，1844：194）。“不必要的民族特性”實際上可能就是指那些阻礙了該民族“進步”的因素。那麼，究竟什麼是“必要的民族特性”？什麼是“不必要的民族特性”？還是所有的民族特性統統都是“不必要的”？又應當由誰來進行評價？

毫無疑問，從人類社會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基因寶庫的角度來考慮，我們不能說一種文明“優於”另一種文明，或者說某一個民族的某些“民族特性”是“必要的”，另一個民族的某些“民族特性”是“不必要的”，因為各個文明處在不同的生存環境中，也處在不同的



文化發展軌跡上，<sup>17</sup> 具有不可比性。但是，如果從文化發展的複雜程度、對文化發展的創新速度、不同文化相遇時彼此競爭的優劣態勢的角度來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不同文明之間確實存在複雜文明與簡單文明（有的甚至沒有書寫文字）之間的區別，存在積極創新的文明與保守停滯的文明之間的區別，在相互競爭中，有的文明處於強勢並對周邊群體進行同化，另一些文明處於弱勢並被強者同化，這樣的群體區別是客觀存在的。經濟競爭中的“馬太效應”現象，同樣存在於不同語言、不同文明的相互競爭之中，這恰恰折射出各自的“生命力”水準。在人類學家的眼裡，不同的文化傳統之間確實很難做出孰優孰劣的評價；但是在戰場上，不同文化傳統所發明的武器之間的優劣態勢是一目了然的。在彼此隔絕的狀態下，不同群體和各自文化可以自然地衍生，但是到了近代各群體彼此相遇並激烈競爭的年代，就出現了一個客觀的競爭規則並決定著各自的命運。在資本主義文明的早期，它在與其他文明的交往和競爭中的表現其實是相當野蠻的，這說明在人類社會真正領悟文化的內涵和學會以文明的方式來處理不同文明之間關係之前，各個文明之間的競爭規則依然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 4、“反革命民族”的歷史命運

一些群體之所以在歐洲革命大潮中扮演著“反革命民族”的政治角色（不是文化角色），那是因為這些群體是在歷史進程中被“進步民族”（歷史發展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擠”和“征服”的對象，這些痛苦的記憶很難忘懷。也正是這些群體在國際博弈格局中爭取“自由”的努力，在客觀上使它們站到了反對歷史潮流的一邊。

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能在某個角落找到一個或幾個殘存的民族，即被那個後來成了歷史發展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擠和征服了的

---

<sup>17</sup> 甚至可以說處在人類文明發展立體空間中的不同“維度”上，彼此互不交叉，沒有同一的測量單位。

以前的居民的殘餘。這些按黑格爾的說法是被歷史進程無情地蹂躪了的民族的殘餘，這些殘存的民族，每次都成為反革命的狂熱的代表者，並且以後還會是這樣，直到它們被完全消滅或者完全喪失其民族特性為止；其實它們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是對偉大歷史革命的抗議（恩格斯，1849a：202）。

這種格局自然並不僅僅存在於歐洲，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也普遍存在於東亞、非洲和其他大陸，不過群體之間的互動大多發生在局部地區，主要採取雙邊衝突的形式。而 19 世紀歐洲的社會革命席捲了全歐洲，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樣一場革命風暴已經使歐洲各民族都直接捲入一場兩個陣營分化對立的鬥爭中，這使得各自的“生命力”和作為“歷史進步或反動的代表者”的政治角色變得格外鮮明並直接落入只有兩種顏色的政治譜系之中。

一千年來一直被德國人和馬扎爾人牽著走的南斯拉夫人在 1848 年所以要起來為恢復自己的民族獨立而鬥爭，是為與此同時把德國和匈牙利的革命鎮壓下去。他們是反革命的代表者……在即將來臨的世界大戰中，不僅那些反動階級和王朝，而且那許多反動民族也要完全從地球上消失。這也將是一種進步（恩格斯，1849a：204，207）。

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再次宣稱：“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倫地亞人、達爾馬威亞人等等，都力圖利用 1848 年的普遍混亂恢復他們在公元八百年時的政治 status quo（狀況），過去一千年的歷史應該已經告訴他們，這樣開倒車是不行的；……泛斯拉夫主義（在德國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區域，它掩蓋著所有的無數的小民族力求恢復獨立的企圖）的浪潮到處都與歐洲的革命運動相衝突，同時，斯拉夫人雖然很想扮演自由戰士的角色，實際上卻總是（除了波蘭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專制主義和反動勢力的一邊”（恩格斯，1852：86~87）。

至於 1848 年南斯拉夫人之所以發動獨立鬥爭的目的是不是為了要“把德國和匈牙利的革命鎮壓下去”，這還是一個需要論證的結論。吊詭的是，也許恰恰是由於處在普魯士和奧匈帝國的統治下，這些少數民族才有可能從“進步的（德國和匈牙利）民族”那裡接觸並吸收了現代“民族”理念，並產生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但是在反對統治民族時，他們的同盟者卻是歐洲的“反動堡壘”沙皇俄國，而且他們當中至少有部分人（上層貴族）的政治目標是恢復被征服以前的封建體制（“公元八百年時的政治狀況”）。所以“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在工業革命時期通過建立“公民的民族國家”來取代世襲封建統治，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又可以成為某些封建復辟者的動員工具。

恩格斯為什麼把這些弱小的民族稱之為“垂死的民族”並對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貼上“反革命”的標籤？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些力量的政治坐標是站在封建割據傳統的立場上來反對資本主義政權的統治，這些觀點充分展示出“民族的馬克思主義”的特點。馬恩明確地指出這種民族獨立運動不僅無益於無產階級革命，而且是“開歷史的倒車”。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在著述中對這些發揮了“反革命”作用的“反動民族”不斷地表達出他們的鄙視、憤恨和詛咒，甚至期盼著這些“反動民族”“完全從地球上消失”。今天有些人可能會對這兩位偉大思想家針對某些民族的激烈言辭感到很難理解，但是這些白紙黑字清楚地告訴我們，不管同意與否，這就是 19 世紀的真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政治立場。

### 三、被壓迫歐洲國家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 民族主義運動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組成部分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許多著述，都是

結合著他們對當時歐洲和世界的經濟發展、政治鬥爭的具體分析和評議所寫下和發表的，有的發表在報紙上（如《新萊茵報》和《紐約每日論壇報》），有的是他們為國際工人組織起草的文件，有的包含在彼此的通信中。下面我們把他們的著述根據不同對象分為三組，第一組是被壓迫歐洲國家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民族主義運動，第二組是被壓迫歐洲國家不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民族主義運動，第三組是亞非拉國家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運動。通過馬恩對不同類型民族問題的具體個案的論述，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他們的主要觀點和觀點背後的分析邏輯。

我們首先分析第一組的情況。在 19 世紀的歐洲，有些地區的工人階級隊伍已有所發展，但這些地區因遭列強瓜分已失去傳統獨立國家地位。對於這一類型的民族主義運動，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予深切同情和高度評價，他們認為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對波蘭和愛爾蘭的由工人階級主導的獨立運動，他們在多篇文章中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 1、波蘭民族獨立運動的進步性質

在東歐的諸多民族主義獨立運動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 19 世紀中葉的波蘭民族獨立運動給予了特殊的關心與支持。與西歐各國相比較，為了使波蘭儘快進入工業文明，土地革命是必要的前提。“在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的各個大農業國家，只有實行土地革命，才能擺脫宗法封建的野蠻狀態，才能把農奴制的或勞役制的農民變為自由的農民，這個革命和 1789 年法國農村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恩格斯，1848b：390）。“在波蘭人中間，共產黨人支持那個把土地革命當作民族解放的條件的政黨，即發動過 1846 年克拉柯夫起義的政黨”（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503）。他們之所以認定這一運動的進步性質，就是因為這一運動與土地革命直接聯繫在一起，而當地傳統的封建土地制度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

克拉柯夫革命既不想恢復舊波蘭，也不想保持外國政府還原封不動地保存著的古代波蘭制度；這次革命既不是反動的，也不是保守的。不，克拉柯夫革命敵視波蘭本身，敵視這個以奴役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陳舊的、封建的、貴族的波蘭，更甚於敵視波蘭的外國壓迫者。克拉柯夫革命絕不是要恢復這陳舊的波蘭，而是要徹底消滅它，並且在它的廢墟上依靠完全新的階級，依靠廣大人民，建立新的、現代的、有文化的、民主的、不愧為 19 世紀的波蘭，要波蘭真正成為捍衛文明的先進戰士。……由於克拉柯夫起義，波蘭問題已由過去的民族問題變成各國人民的問題，已由過去的同情對象變成與一切民主主義者有切身關係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b：539~540）。

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問題和民主問題以及被壓迫階級的解放看作一回事，這就給整個歐洲做出了光輝的榜樣（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b：537）。

正是因為波蘭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聯繫著，正是因為“波蘭人”和“革命者”兩個詞成了同義語，波蘭人就贏得了全歐洲的同情，保證了他們民族的復興，而捷克人、克羅地亞人和俄國人卻受到全歐洲的憎恨，整個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戰爭來反對他們（恩格斯，1849：337）。

與此同時，“只要我們還把波蘭的一部分拴在德國身上，我們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國和俄國政策的束縛，我們在國內就不能徹底擺脫宗法封建的專制體制。建立民主的波蘭是建立民主德國的首要條件”（恩格斯，1848b：390~391）。“當奧地利和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和政府的背後還站著一個俄國的時候，德意志工人運動的雙手是被束縛著的。所以，我們比別人更關心於擺脫俄國反動勢力和俄國軍隊的羈絆。在這方面，我們只有一個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靠的同盟者：波蘭人民”（恩格斯，1874：576~577）。從歐洲工人階級

運動的根本利益來考慮，可以說“歐洲所有其餘各國工人都像波蘭工人本身一樣需要波蘭的獨立”（恩格斯，1892：330）。

概括地講，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全力支持波蘭獨立運動，基於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就是這一運動堅決主張土地革命，其革命對象是陳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其性質已經超越其他單純反對“外國壓迫者”的民族獨立運動，展現出社會進步（即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過渡）的民主主義的一面，蘊含著無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內涵。<sup>18</sup> 這是通過民族內部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角度來判定這一運動的性質屬於“進步”還是“反動”。第二就是波蘭的獨立將使東方的反動堡壘沙皇俄國和德國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受到嚴重打擊，這將極大地削弱沙皇俄國對德國的政治影響，有利於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從而促進德國的無產階級運動。這是從世界和歐洲工人運動整體利益和戰略的角度來評價波蘭的民族主義運動。

## 2、對波蘭民族“生命力”的再評價

如果不是從當時革命運動中波蘭民族所扮演的政治角色這個角度來思考問題，在另外一些論述中，恩格斯對波蘭的“生命力”和“同化能力”的評價卻並不高。他在1851年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愈是思考歷史，就愈是明白：波蘭人是一個毫無希望的民族，它只是在俄國本身進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時候有當工具的用處。在這之後，波蘭就絕對不再有存在的理由。……相反地，俄國和東方相比確實是進步的。俄國的統治，不管怎樣卑鄙無恥，怎樣帶有種種斯拉夫的骯髒東西，但對於黑海、里海和中亞細亞，對於巴什基里亞人和韃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而且俄國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別是工業因素，也比具有小貴族懶惰本性的波蘭多得多。……波蘭從來不會同化異族的分子——城市裡的德國人始終是德國人。但是俄國卻

---

<sup>18</sup> 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積極致力於創建“民主的德國”和“民主的波蘭”。

很會把德國人和猶太人俄羅斯化，每個第二代的俄籍德國人都是明顯的例子”（恩格斯，1851：285）。在接受“工業因素”即資本主義因素方面，恩格斯認為波蘭人甚至還不如俄國人。沙皇俄國的政治領導集團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但是在吸收西歐資產階級文明時，卻表現出比波蘭人更多的活力，而且在與其他民族相遇時表現出具有更強的同化異族的能力。在俄國廢除農奴制以後，“波蘭就絕對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恩格斯在1866年做出的這一結論與前面介紹的他本人在1848年、1874年和1892年堅持的支持波蘭獨立、抨擊反動堡壘俄國的觀點截然相反。這一點多少令人有些費解。

在民族的“進步性”和民族的“生命力”之間看來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在國際革命運動中表現出“進步性”的民族，並不一定是具有更強的“生命力”的民族；反之，在國際鬥爭中站在“反動陣營”一邊的民族，也未必是缺乏“生命力”的民族。以上沙皇俄國和波蘭之間的比較就是一個例子。又例如在鴉片戰爭後的東亞，我們很難評價說清朝政府比日本領導集團更“反動”，但是日本社會在吸收歐洲文明和資本主義因素方面卻遠勝清朝，而且日本在歷史上曾多次展示出積極向其他先進鄰國學習的主動性和學習能力，這也恰恰體現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力”。政治上反動與否，與民族的“生命力”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相關關係。“生命力”根植於深厚的文化傳統之中，而“進步性”也許僅僅體現在某個歷史時刻在政治鬥爭中的立場和角色。也許我們應當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恩格斯對波蘭民族的兩種十分不同的評價。

### 3、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進步性質

也正是在討論這些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察覺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離間與分化“壓迫國家”和“被壓迫國家”工人階級隊伍方面的嚴重危害性。

馬克思指出，由於受到資產階級散佈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

“英國所有的工商業中心的工人階級現在都分裂為英國無產者和愛爾蘭無產者這樣兩個敵對陣營。普通的英國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把他們看作會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競爭者。英國工人覺得自己對愛爾蘭工人來說是統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為如此，他們就變成了本民族的貴族和資本家用來反對愛爾蘭的工具，從而鞏固了貴族和資本家對他們自己的統治。他們對愛爾蘭工人懷著宗教、社會和民族的偏見。他們對待愛爾蘭工人的態度大致像以前美國各蓄奴州的白種貧民對待黑人的態度。而愛爾蘭人則以同樣的態度加倍地報復英國工人。同時他們把英國工人看作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的同謀者和盲目的工具”（馬克思，1870：655~656）。

正是英國和愛爾蘭資產階級各自鼓吹的民族主義分裂了兩國無產階級，使他們依照民族劃分陣營並彼此仇恨。馬克思同時也深刻地反省了自己過去的觀點，“我長期以來就認為可能借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高漲來推翻統治愛爾蘭的制度；……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以後，現在我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國工人階級沒有擺脫愛爾蘭，那就毫無辦法。槓桿一定要放在愛爾蘭。因此愛爾蘭問題才對整個社會運動有這樣重大的意義”（馬克思，1869：398）。<sup>19</sup> 在這一具體場景下，“民族”和“民族主義運動”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派統治工具的反動性和社會影響，主要不是體現在愛爾蘭的民族主義運動中，而體現在英國工人隊伍中的“民族主義”思潮中。正是由於英國資產階級灌輸的“民族主義”觀念，使英國工人放棄了“階級”的立場，站在“民族”的角度來反對愛爾蘭的工人群眾。

英國作為資本的大本營，作為至今統治著世界市場的強國，在目前對工人革命來說是最重要的國家，同時它還是這種革命所需要

---

<sup>19</sup> 馬克思曾從理論上認為“先進的”英國工人階級會積極推翻英國資產階級對愛爾蘭的統治，當他發現英國工人階級已經被“民族主義”毒害之後，他轉而認為受壓迫的愛爾蘭工人階級更具革命性。這是馬克思在世時對自己曾經持有觀點的重要更正。



的物質條件在某種程度上業已成熟的惟一國家。因此，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就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最重要的目標。而加速這一革命的惟一辦法就是使愛爾蘭獨立。……倫敦中央委員會的特殊任務就是喚醒英國工人階級，使他們意識到：愛爾蘭的民族解放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正義或博愛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馬克思，1870：656~657）。

對於統治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國家（如英國）的工人運動來說，在被統治歐洲國家（如愛爾蘭）由本國工人階級發動的民族獨立運動具有特殊的積極意義，它將削弱統治國家資產階級政權的財政實力，剝奪這些政權用以分化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武器。<sup>20</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敏銳地注意到，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從殖民地掠奪來的財富在經濟上被腐蝕了，同時被本國資產階級宣揚的“民族榮耀”（統治別國的“上等民族”）在思想和精神上被民族主義毒害了，這使他們背離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正是由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表現使馬克思極度失望，所以他轉而把目光投向了愛爾蘭工人階級。“釜底抽薪”，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寄希望於被統治歐洲國家工人階級發動的民族獨立運動的重要原因。

換言之，馬克思之所以正面評價波蘭和愛爾蘭的民族獨立運動，就是因為它們一方面自身即帶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性質，另一方面就是有利於打擊統治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權，有利於喚醒英國工人、德國工人的階級覺悟，在整體上推動歐洲的工人運動。而那些發動和領導以無產階級為社會基礎、有利於國際工人運動發展的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們，也是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與讚揚的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領袖人物。

---

<sup>20</sup> 帝國主義國家在被統治國家（如波蘭、愛爾蘭）所攫取的經濟收入，可用來收買本國的工人領袖和工會組織，並利用本國工人和被統治國家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來分化和離間國際工人運動。

#### 四、被壓迫歐洲國家不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可能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

我們再來分析被壓迫歐洲國家不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民族主義運動。

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觀點，就是人類社會的所有制形態隨著分工的發展呈現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社會形態的演進過程。“第一種社會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奴隸制仍然是整個生產的基礎。……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25~27）。“從滅亡了的封建社會裡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6、468）。“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任務是建立世界市場（至少是一個輪廓）和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由於地球是圓的，所以隨著加里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化，隨著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開放，這個過程看來已完成了”（馬克思，1858b：348）。而資本主義社會又將隨著社會的發展必將為共產主義社會所取代，“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79）。

正是這樣一個宏觀的歷史潮流的大方向決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立場，他們在遇到具體個案時，必然超越各個國家、各個群體的利益得失，而從各群體在這一社會形態演進的大進程中的“進步”和“反動”作用來分析和評判各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和獨立運動。

如果一些歐洲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的主導力量不是本國的無產階級，所代表的並不是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而是前資本主義的政治傳統和經濟結構，其政治目的與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這樣的社會進步運動無關，是“開歷史倒車”，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

這樣的民族主義運動，則明確地持批評和反對的立場。他們認為，儘管這樣的“民族主義”運動可能打著“民族自由”、“民族解放”、“反抗壓迫”的旗幟，但其努力的方向和實際社會效果卻具有阻礙人類社會進步、復辟封建專制、破壞和鎮壓工人運動的反動性質。

### 1、歐洲東部的“泛斯拉夫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批評的是歐洲的“泛斯拉夫主義”。當時“俄國愛國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會代表”米哈伊爾·巴枯寧在 1848 年發表了民主泛斯拉夫主義的綱領“對斯拉夫人的號召”，提出“只要歐洲還有一個民族受著壓迫，各民族的幸福安寧就無法得到保障……廢除各種暴君會議基於所謂歷史的、地理的、貿易的和戰略的考慮強行劃定的各種人為的界線！除了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權意志根據其民族特點所確定的界線，即根據正義和民主的精神劃定的自然界線以外，不應該有任何其他的界線。這就是各族人民一致的呼聲”（參見恩格斯，1849b：323~324）。

今天中國讀者在讀到這樣一段文字時，恐怕很少有人自認為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予以駁斥。為什麼會是這樣？這恰恰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因為恩格斯給予了激烈的反駁。

就在這個綱領發表的一年後，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一文中針對這一綱領給予最嚴厲的批評，並詳細地反駁巴枯寧鼓吹泛斯拉夫主義的各種論據。他在援引了上面這段話後寫道：“從這段話中我們已經完全可以重新看到革命最初幾個月中的那種一味耽於幻想的狂熱。這裡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實際存在的妨礙這種普遍解放的障礙，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其差別如此之大的各個文明發展階段，以及由這一點決定的各族人民的不同政治要求”（恩格斯，1849b：324）。

恩格斯強調了三點，其一是需要認清民族解放的實際障礙是什麼，而不是空談“平等”、“民主”等好聽的口號；其二是強調各民族依然處在差別極大的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其三是必須認識到，處

在文明發展不同階段的各族人民有著不同的政治要求。

針對巴枯寧提倡的“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權意志根據其民族特點所確定的界線”，恩格斯舉出美國和墨西哥之間邊界改變的例子：“美國和墨西哥是兩個共和國，這兩國的人民都是自主的。……由於得克薩斯問題，在它們之間爆發了戰爭；……富饒的加利福尼亞從對它毫無作為的懶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擺脫出來，這有什麼害處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國佬迅速地開發那裡的金沙礦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時間內在太平洋沿岸最適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開展廣泛的貿易，建立許多大城市，開闢輪船交通，鋪設從紐約到舊金山的鐵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觸現代文明，在歷史上第三次為世界貿易開闢新的方向，那有什麼不好呢？當然，加利福尼亞和得克薩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獨立’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遭到侵害；‘正義’和其他道德原則也許會受到一些破壞；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比較起來，這又算得了什麼呢”（恩格斯，1849b：326）。

通過這個例子，恩格斯表明如果處在較高文明發展階段的民族（“精力充沛的美國佬”）的佔領將使加州的自然資源得到更好的開發、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那麼美國吞併加州就不是壞事，因為這使得“富饒的加利福尼亞從對它毫無作為的懶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擺脫出來”，儘管加州西班牙人失去了獨立，“正義”和其他道德原則受到破壞。美國和墨西哥處在文明的不同發展階段，一個生機勃勃處於強勢，一個相對保守停滯居於弱勢；美國人和墨西哥人也有不同的政治要求，一個要向外擴展領土，一個反對外國入侵和瓜分。恩格斯不僅在理性上認同美國的吞併行為，因為他認定美國會使加州和太平洋西岸迅速繁榮起來，他在感情上也沒有對弱者表示同情，稱他們是“懶惰的墨西哥人”。所以，凡是有利於國際資本主義發展、在世界各地推動工業化和商品生產的行為，哪怕有損於抽象的“道義”和“公正”，這樣的行為就能夠得到恩格斯的肯定，因為這是“具有全

世界歷史意義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恩格斯對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形態進步的高度重視，和他對一些像巴枯寧那樣的人脫離人類社會歷史進程而以抽象的“道德價值”來空談“民族權利”的批判。

恩格斯接著談到歐洲大陸的各斯拉夫民族，“除了波蘭人之外，這些人全都屬於這樣的民族，這些民族或者像南斯拉夫人一樣，由於其全部歷史狀況必然是反革命的民族，或者像俄羅斯人一樣，距離革命還很遠，因此它們至少在目前還是反革命的。……那些從來沒有自己的歷史，從達到文明發展的最初階段的時候起就陷於異族統治之下，或者只是由於異族的壓迫才被強迫提高到文明發展的最初階段的民族，是沒有生命力的，是永遠也不可能獲得什麼獨立的。……從11世紀開始，他們就連政治獨立的最後一點影子也喪失了，他們分別受到德國人、威尼斯人和馬扎爾人的統治。現在竟有人想把這些破爛的碎片拼湊成一個堅固、獨立並且有生命力的民族”（恩格斯，1849b：327~328）。在這裡，恩格斯把民族的文明發展程度與民族歷史和“生命力”聯繫在一起，從而把這些群體定性為“反革命的民族”和不可能獲得獨立的民族，並以此作為批判“泛斯拉夫民族主義運動”的理由。

歐洲斯拉夫人後來的發展歷史也確實十分曲折坎坷，保加利亞人在1885年最終從奧斯曼帝國獨立，塞爾維亞人1878年獨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及其他南斯拉夫人在1918年獲得獨立。但是，二戰後組建的南斯拉夫聯邦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半個世紀後又解體分裂為近十個小國家，所以巴枯寧倡導的“泛斯拉夫國家”即使在隨後的內外條件作用下得以形成，恐怕也確如恩格斯所說，很難成為“一個堅固、獨立並且有生命力的民族”。

## 2、“泛斯拉夫主義”與俄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泛斯拉夫主義”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一運動的後方始終籠罩著沙皇俄國的陰影。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

夫主義”中繼續寫道：“當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和馬扎爾人舉起革命旗幟的時候，斯拉夫人卻像一個人一樣全都站到反革命的旗幟下面了。走在前面的是很久以來一直對馬扎爾人堅持其反革命的分離主義打算的南方斯拉夫人，其次是捷克人，他們後面是武裝起來的、準備在決定關頭投入戰鬥的俄國人”（恩格斯，1849b：336）。“泛斯拉夫主義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由俄國統治的從厄爾士山脈和喀爾巴阡山脈直到黑海、愛琴海和亞得利亞海的斯拉夫國家。……泛斯拉夫主義的統一，不是純粹的幻想，就是俄國的鞭子”（恩格斯，1849a：201）。

因此，如果多民族帝國內部少數群體的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另一個反動帝國主義國家支持的背景，例如受到沙俄支持的奧匈帝國內部捷克和克羅地亞的“泛斯拉夫主義”運動，恩格斯就會基於工業化和社會性質的“進步”和“落後”予以更加嚴厲的批判，認為這是“荒唐的、反歷史的運動，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屈服於野蠻的東方，城市屈服於鄉村，商業、工業和文化屈服於斯拉夫農奴的原始農業”（恩格斯，1852：56）。而這些斯拉夫民族的領袖們，因為站到了反革命陣營一邊，也受到恩格斯的強烈批判：“那些還繼續胡說什麼民族平等、民主的奧地利等等的南方斯拉夫人運動的領導者們，不是變成了像許多報紙的無恥文人一樣的愚蠢的空想家，就是變成了像耶拉契奇一樣的惡棍”（恩格斯，1849a：203）。“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口號，並不一定真正代表進步，也許只是掩蓋真實政治目的的遮羞布。

恩格斯認為，自1789年以來，“歐洲大陸實際上只存在著兩種勢力：一種是俄國和專制，一種是革命和民主”（恩格斯，1853：18）。而東歐的“各小斯拉夫民族把沙皇看作是他們惟一的解放者，……一旦發生戰爭，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小民族就會站在沙皇制度一邊，即站在資本主義發達的整個西方的敵人一邊。只要情況是這樣，我就不可能對他們的直接的、迅速的解放感興趣，它們同它們的盟友

和庇護者沙皇一樣，仍將是我們的直接的敵人。我們應當為爭取西歐無產階級的解放而共同奮鬥，應當使其他的一切都服從這個目的。不管巴爾幹的斯拉夫人等等多麼令人感興趣，只要他們的解放願望同無產階級的利益相抵觸，那我就同他們毫不相干”（恩格斯，1882：271~272）。

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各斯拉夫民族，在政治上遭受壓迫，在經濟上遭受剝削，在文化上被強制同化。那麼它們是否有權利追求民族獨立呢？即使他們在經濟和生產關係上相對落後於對他們實行統治的民族，它們追求獨立的民族主義運動應當算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是否只因為它們希望在獨立鬥爭中獲得強大的“斯拉夫同胞”（俄國）的支持，它們的民族獨立運動就完全改變了性質呢？即使到了今天，當我們回顧歐洲的這一段歷史時，我們仍然可以給自己提出這樣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切泛斯拉夫主義者都認為，民族特性，即虛構的全體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是高於革命的。……他們竟要求我們和歐洲的其他革命民族保證反革命勢力可以直接在我們的大門口肆無忌憚地存在，保證他們有策劃陰謀和武裝起來反對革命的權利；……我們的回答是：恨俄國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德國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自從革命開始以來又加上了對捷克人和克羅地亞人的仇恨，只有對這些斯拉夫民族實行最堅決的恐怖主義，我們才能夠同波蘭人和馬扎爾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恩格斯，1849b：341~342）。

通過對語言與方言的分析，恩格斯認為各斯拉夫民族之間不存在“全體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堅決反對把“民族利益”置於“革命鬥爭”之上。正如康納“三支系說”的分析，恩格斯以上這段話是“民族的馬克思主義”最好的例證，這裡把俄國人、捷克人和克羅地亞人這些民族的整體作為德國人、波蘭人和馬扎爾人民族的仇敵。“恨俄國人”成為德國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在這裡我們已經完

全看不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影子了。

從恩格斯的上述引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馬克思所持的基本立場：凡是不代表先進生產力、與國際工人運動背道而馳的“民族主義”運動，它們的立場必然站在封建專制制度、反革命陣營一邊。恩格斯明確地認定這樣的“民族主義”運動及其領導者就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歐洲“反革命民族”和“垂死的民族”的論述，所針對的就是這一類型的民族主義運動。

## 五、亞非拉國家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運動 可以削弱帝國主義政權

19世紀後期，非洲、亞洲、澳洲和拉丁美洲大陸已經被各帝國主義國家瓜分完畢，勉強維持政治獨立的只剩下中國、日本、泰國和伊朗（波斯）等極個別國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市場貿易逐步滲透到了地球上每一個角落，“資產階級……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純樸的關係統統破壞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都捲入文明的漩渦裡了。……它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70）。同時，亞非拉各國由於已經被迫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這些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形勢已經開始對歐洲國家的財政和社會穩定發揮著重要作用，歐洲國家在海外作戰和殖民地統治的失敗很可能導致本國政府的政治危機甚至垮臺，這樣一種緊密的因果關係也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關注亞非拉國家的社會結構、經濟形勢和民族主義運動。

站在歐洲革命和工人運動的立場上來看待亞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主要是分析這些運動會給歐洲革命帶來哪些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由於亞非拉各國和殖民地已經成為歐洲資本主



義發展的重要原材料與人力來源、商品市場和各國政府的財政支柱，這些國家出現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佔領和剝削的民族主義運動將對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財政和軍力造成鉅大衝擊。這些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運動未必是歐洲工人階級的自覺的同盟軍，但是他們面對共同的敵人：歐洲資產階級政府及軍隊。出於這一考慮，馬克思認為這些民族主義運動在客觀上有利於歐洲工人運動的發展和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鬥爭，應當給予支持。

縱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亞非拉國家的論述，可以大致分為五個層次或五個方面：（1）認定這些國家在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方面停滯在保守的模式，正是這種缺乏“生命力”的體現使得這些地區成為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侵略、殖民和奴役的對象；（2）其中一些國家（特別是有古老文明傳統的國家）在本地區具有相對較高的“生命力”和同化周邊群體的能力，也在反侵略鬥爭中顯示出一定的學習能力；（3）在開展侵略和殖民的過程中，歐洲列強赤裸裸的霸道邏輯和強盜行徑，充分體現了基督教民族對待異族的“雙重標準”；（4）在軍事力量極為懸殊的反侵略戰爭中，落後民族通常委屈求和，儘管時常佔有“道義”，但戰爭結果通常十分悲壯；（5）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些“衰落民族”的困境和悲慘命運表示了同情，但是認為它們的衰亡“是人類進步必需付出的代價”，是歷史的必然。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亞非拉各國社會變遷和獨立運動的關注較多的是印度、中國、波斯和土耳其。本文主要討論他們關於中國和印度的論述。

### 1、中國與歐洲革命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馬克思首先闡述了中國革命對歐洲的直接和關鍵性的影響：“‘對立統一’是否就是這樣一個萬應的原則，這一點可以從中國革命對文明世界很可能發生的影響中得到明顯的例證。歐洲各國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

共和自由和爭取比較廉潔的政體的鬥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決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的對立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取決於現時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決於俄國的威脅及其後果——可能發生的全歐洲的戰爭。這種說法看起來非常奇怪和荒誕，然而，這絕不是怪論，凡是仔細考察了當前情況的人，都會相信這一點”（馬克思，1853a：109）。

為什麼中國發生的事情能夠對歐洲有這麼大的影響？就是因為在中國獲得的經濟利益和銷售市場對於歐洲（特別是英國）太重要了。馬克思隨即分析了鴉片貿易如何導致中國大量輸入英國紡織品，並由此造成英國工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不列顛的工業自1850年以來空前發展……市場的擴大仍然會趕不上不列顛工業的增長，……這時，如果有一個大市場突然縮小，那末危機的來臨必然加速”（馬克思，1853a：112）。所以馬克思認為自己“可以大膽預言，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馬克思，1853a：114）。因此馬克思熱切地期待著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社會革命和民族主義運動將會挖掉歐洲資本主義世界的重要基石，從而推動和促進歐洲的革命與工人運動。

## 2、西方的侵略打破了中國的閉關自守狀態

以上講的是中國發生的事件將如何影響英國和歐洲，那麼鴉片戰爭和與西方列強的接觸又給中國人帶來了什麼呢？那就是中國在東亞保持了幾千年作為文明和政治中心的“天下體系”被洋槍洋炮徹底擊得粉碎。“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延續了十年之久，現在已經匯合成一個強大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炸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

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馬克思，1853a：109~110）。這也就是李鴻章驚呼的中國“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馬克思，1853a：111~112）。

維繫這一“天下體系”的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一旦被打破，傳統的協調、重組機制又在外力干預下徹底失效，這使擁有四億人的中國社會既失去傳統社會組織的紐帶，又迷茫了未來前進的方向，整個國家陷入一片混亂。

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甲午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戶自己也製造自己使用的工業品），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千百萬人將不得不離鄉背井，移居國外；他們也將找到去歐洲的道路，大批地湧入歐洲。而中國人的競爭一旦成為群眾性的，那末這種競爭無論在你們那裡（德國）或是在我們這裡都會迅速地極端尖銳化，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就會對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起推動作用（恩格斯，1894：297）。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預見到了一旦中國人加入國際勞動力市場的競爭隊伍後，中國向海外（包括歐洲）的大規模移民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勞動者的勤勞節儉和傳統的低收入預期使得他們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而這必然會對歐美的就業市場和經濟結構帶來衝擊。此時，“資產階級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場，這就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樣傷心，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工

業腳下的民族基礎。舊的民族工業部門被消滅掉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著”（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9）。中國的製造業和商業、服務業必然會逐步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並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中國之所以能夠保持幾千年延續不斷的文明傳統並長期居於東亞文明中心地位，這決不是偶然的，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評價民族的三個因素即“生命力”、“同化異族能力”和“引領歷史潮流”來分析，應當說在19世紀遇到工業化的歐洲列強之前，中國人在東亞各民族中是長期居於中心位置的。恩格斯在論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軍民的表現時，曾特別提到：“在一切實際事務中——而戰爭就是極其實際的——中國人遠勝過一切東方民族，因此毫無疑問，英國人定會發現中國人在軍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恩格斯，1857a：190~191）。此時恩格斯尚未注意到另一個東方民族日本的迅速崛起，但他對中國人基本素質的肯定並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中曾經證明了自己的生命，今天新一代中國人將以我們自己的努力來進一步予以證明。

### 3、列強在中國的強盜行徑和歐洲媒體的“雙重標準”

歐洲各國自稱是人類最高文明的代表，其他各大陸的民族都是未開化或半開化的“野蠻人”，但是這些歐洲文明的代表為什麼在與其他文明打交道時完全不遵守歐洲各國之間的外交規則呢？一百多年後，美國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講出了其中的道理，那就是歐洲人在與其他民族打交道時採用的是“雙重標準”：“歷史上，相同文明的國家或其他實體之間的關係有異於不同文明的國家或實體之間的關係。對待‘像我們’的人的指導原則與對待不同於我們的‘野蠻人’的指導原則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國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則不同於它們與土耳其人和其他‘異教徒’打交道的原則”（亨廷頓，1999：134）。

這種“雙重標準”的思維方式不僅存在於基督教傳統的歐美各

國的政治家、軍人、外交家和學者當中，而且特別鮮明地表現在歐美各國媒體對發生在“自己人”和“野蠻人”之間衝突的報道方面。近些年來，中國人對西方媒體的“有選擇性的”、“有價值傾斜”的新聞報道已經有所領教。在閱讀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時，我們發現歐洲媒體的這種傳統其實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在英國一再對中國進行霸權式的干預和侵略時，馬克思就曾對英國和歐洲媒體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大加撻伐：“英國報紙對於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在英國庇護下每天所幹的破壞條約的可惡行為是多麼沉默啊！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充實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經常賄賂下級官吏而使中國政府失去在商品進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對那些被賣到秘魯沿岸去充當連奴隸都不如的牛馬以及在古巴被賣為奴的受騙的契約華工橫施暴行‘以至殺害’的情形，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常常無恥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國人的情形以及這些外國人在各通商口岸幹出的傷風敗俗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馬克思，1857：178）。這些話在今天的中國人聽起來，一點兒也不陌生。因為即使進入21世紀後，西方國家的民衆能否通過報紙和傳媒全面和公正地瞭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依然是受到質疑的。

“18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已經達到兩千箱。……中國皇帝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既禁止外國人輸入這種毒品，又禁止中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鴉片以及向中國私賣鴉片變成自己財政系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蠻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繫的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基於道義原則，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

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馬克思，1858a：587）。馬克思指出在歐洲列強與古老的中國打交道時各自的遊戲規則：“半野蠻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中國人反對吸毒，堅持講信義和遵守條約，西方人則採用雙重標準，不擇手段、毫無信義，堅持以販毒來發財。這真是最“離奇的悲劇題材”。

無論如何，古老的中國是不可能按照原來的模式繼續生存下去了，天朝的大門已經被大炮轟成碎片，再也關不上了。只要我們依然保持著幾千年來延續下來的生命力，中國人就將在反侵略戰爭的廢墟上重建自己的國家與社會。

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那就是舊中國的末日正在迅速到來。……中國南方人在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態度本身，顯然表明我們已覺悟到古老的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恩格斯，1857b：233~234）。

#### 4、傳統的印度社會被西方國家徹底改造

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馬克思把印度看作是一個停滯和保守的古代文明社會。“從遙遠的古代直到19世紀最初十年，無論印度的政治變化多麼大，可是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馬克思，1853b：146）。而且似乎只有來自外部的統治者，才使印度的基層社會得以聯結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在它不處於穆斯林、莫臥兒或不列顛人的壓迫之下的那些時期，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莊那樣多的各自獨立的和相互敵對的國家”（馬克思，1853b：143），這也是這個面積龐大的次大陸最終被數量很少的英國遠征軍完全征服的主要原因。印度以分散和各自獨立的傳統村社和城市土邦作為基本社會組織，缺乏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傳統和清朝的政制統一，

所以徹底地淪為英國的殖民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去殖民地化”浪潮才獲得獨立。

但是印度畢竟是一個文明古國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它是佛教、印度教和錫克教等東方宗教的發源地，而且在歷史上證明了其傳統文明的生命力和同化異族的能力。“相繼征服過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爾人，不久就被當地居民同化了。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不列顛人是第一批發展程度高於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響不了他們。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突出的一切，從而消滅了印度的文明”（馬克思，1853c：247）。但是也正是由於印度社會保守停滯的頑固惰性，使其失去文化創新能力而無法與時俱進，最後像一顆熟透了的果實那樣輕鬆地落到英國殖民者的手裡。

隨後，這一古老的文明體系以及它賴以生存的基層經濟結構都被歐洲的殖民者徹底摧毀。正是“不列顛的蒸汽和不列顛的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馬克思，1853b：147）。英國在破壞了印度的傳統社會結構之後，通過對貴族子弟的歐式教育把印度變成一個上層集團“不列顛化”加上基層組織破碎化的社會，從而變成一個適於進行殖民統治的大市場。與此同時，英國殖民者從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出發，開始推動印度的交通和通訊現代化。“英國的工業鉅頭們之所以願意在印度修築鐵路，完全是為了要降低他們的工廠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價格。……鐵路在印度將真正成為現代工業的先驅”（馬克思，1853c：250）。隨著全印度鐵路系統和現代交通體系的建立，隨著英國殖民政府在各管轄區實施的有效行政管理，這些措施必然推動了印度次大陸各地社會組織的“同質化”，也使各地民衆之間出現了對“印度”的政治與文化認同。因此，印度成為我們研究非歐洲國家、特別是具有古代文明傳統

的非歐洲國家如何在外力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制摧毀和殖民政府的直接塑造下逐漸演變成爲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難得的案例。正是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誕生與生長，成爲印度社會政治轉型的關鍵樞紐，爲獨立後印度的“民族構建”（nation building）奠定了基礎。

### 5、印度成爲大英帝國的經濟命脈

印度的遼闊領土和龐大的人口成爲英國工業產品的不可替代的鉅大市場，儘管這是以摧毀印度傳統手工業作爲代價。“自古以來就是最大的棉織品工場，向全世界供應棉織品的印度，這時到處充斥著英國的毛織品和英國的棉織品。印度本國的製品在英國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條件下才允許輸入英國，但英國工業品卻充斥印度，關稅負擔很小，或者有名無實，這樣就毀滅了一度十分聞名的印度棉織業。……棉紡織業愈來愈成爲大不列顛整個社會制度的命脈，東印度也隨之愈來愈成爲不列顛棉紡織業的命脈”（馬克思，1853d：174）。不平等的貿易安排和赤裸裸的剝削，這就是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正是在這樣的經濟模式當中，印度已經成爲英國經濟的主要命脈，在印度發生的社會革命必然打擊英國本國的資本主義統治。1857年堅持數月並一度佔領德里的印度北部大起義，對英國政府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出於對英國工人運動前景的關切，馬克思仔細地分析了印度與英國之間的貿易與關稅，並期盼著未來的印度社會革命將會有助於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亞洲各國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下發展起來的工業化和“歐洲化”（可能是扭曲和表面化的）的社會組織，必然會使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完成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爲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就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爲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力的統治。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爲新世界創造這些物



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為地球創造了表層一樣”（馬克思，1853c：252）。相信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馬克思，堅信亞洲傳統社會的毀滅和殖民主義的經濟擴張將會使亞洲“資本主義化”，從而為未來的“新世界”奠定物質基礎。

#### 6、印度傳統社會的破壞是不可避免的，儘管令人同情

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印度傳統社會遭到了徹底的破壞。“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我在這裡所指的還不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式的專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式的專制，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裡的猙獰的神像更為可怕”（馬克思，1853b：144）。“（歷史上的）內戰、外侮、政變、被征服、鬧饑荒——所有這一切接連不斷的災難，不管它們對印度斯坦的影響顯得多麼複雜、猛烈和帶有毀滅性，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而英國則破壞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會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並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繫”（馬克思，1853b：145）。

但也正是由於外來力量這樣徹底和無情的破壞，使古老的印度脫離了幾千年的傳統軌道，而發生了一次真正的社會革命，進入一個全新的演變模式。站在西方文化觀察東方文明的角度，同時也站在“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立場，馬克思對印度傳統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使用的詞彙包括“消極”、“半野蠻”、“缺乏歷史首創精神”。

英國的干涉……破壞了這種小小的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因為這破壞了它們的經濟基礎；結果，就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

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這種消極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慘殺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儀式。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帶著種姓劃分和奴隸制度的標記（馬克思，1853b：148~149）。

同時，馬克思也一再揭露和批判英國殖民者在侵略和奴役印度民衆時的強盜行徑和卑鄙動機，也不時對印度民衆在喪失自己社會傳統後的失落及在新的剝削制度下遭受的苦難表露出深切的同情。但是他始終認為，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帝國主義者客觀上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地工具”。“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1853b：149）。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者在亞洲和其他地區的野蠻侵略和殘酷統治，是為了完成資本主義的雙重使命：“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馬克思，1853c：247）。

在這些論述中，馬克思把印度民族被奴役的命運看作是某種歷史的必然。“印度社會根本就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它的歷史，不過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征服者的歷史，這

些征服者就在這個一無抵抗、二無變化的社會的消極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帝國。因此，問題並不在於英國是否有權利來征服印度，而在於印度被不列顛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征服好些”（馬克思，1853c：246~247）。這樣一種關於印度的歷史觀，今天的歷史學家（特別是印度的歷史學家）恐怕是很難贊同的。按照這樣的邏輯，整個美洲的土著民族都是沒有歷史的，它們的歷史可能只能從西班牙人入侵的時刻算起，而且加利福尼亞和得克薩斯在美國的統治下要比在墨西哥人治理下要好；除地中海沿岸之外的非洲大陸是沒有歷史的，歐洲殖民者在黑非洲傳播了文明。是否生產力和工業化的水平就一定代表著社會的進步呢？按照這樣的邏輯，可以推論出中國在英國統治下也許要比在沙皇俄國統治下要好。遠在鴉片戰爭之前，林則徐就已洞見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野心，中國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沒有亡國，那是四萬萬同胞誓死抗爭的結果。

康納認為馬克思的一些著述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在海外的殖民和侵略活動進行了辯護，辯護的理由就是“這些殖民活動給前工業社會的非洲和亞洲人民帶來了推動他們走向更先進經濟階段的有效手段”，“他（馬克思）更願意看到這些（前工業化的）人類群體被從屬於（attached）更先進的民族”（Connor, 1985：9）。當然，這與馬克思始終忽視民族的文化心理因素、過於強調生產力和經濟形態因素的“社會形態進化論”有關。

在批評印度傳統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同時，馬克思對印度人民的優秀素質也給予了肯定，並且依此認定印度必將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印度人民特別有本領適應完全新的勞動並取得管理機器所必需的知識。在加爾各答造幣廠看管蒸汽機多年的本地技師們表現出來的本領和技巧，在哈爾德伐爾煤區看管各種蒸汽機的本地人的勞動情況以及其他許多實例，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個事實。……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這多少是遙遠的未來，這個鉅大而誘人的

國家將復興起來。這個國家裡的人民文雅，用薩爾梯柯夫公爵的話來說，甚至最低階級裡的人民‘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細更靈巧’；這個國家裡的人民的沉靜的高貴品質甚至抵消了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馴服性”（馬克思，1853c：250~251）。雖然印度人長期缺乏引領歷史潮流的動力，但是印度民族是具有一定生命力和同化周邊異族的能力的，當他們在英國統治下掌握了新的生產力和學會了製造技術和現代貿易手段後，印度作為一個全新的“進步的”民族必然會在亞洲重新興起。

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傳統社會的衰亡是歷史的必然，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但他們始終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卑鄙動機和殘酷暴力給予譴責。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的“工業資本家的產生”一節中曾深刻地揭露和譴責了歐洲帝國主義在亞非拉的殘暴及掠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跟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並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1867：819，829）。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堅決反對民族壓迫的，恩格斯曾明確指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恩格斯，1874：577）。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中國、印度社會的發展特徵以及中國、印度與歐洲的關係時，始終是把中國和印度作為兩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來討論的，其中自然有他們的道理。中國和印度內部都存在許多語言、宗教、血緣、發展歷史各不相同的許多群體，在清帝國和莫臥兒帝國的統治下，帝國的行政管理體系也呈現一定的多元化。費孝通教授用“多元一體格局”來表述中國傳統的內部族群關係結構是很貼切的，這是一種與西歐政治體系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系統，內部各群

體之間存在著歷史悠久的“剪不斷、理還亂”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血緣關係。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系列反侵略戰爭中，中國人基本上整體一致對外。十分熟悉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把“中國”和“中國人”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來討論和分析，實質上就是認同中國是一個潛在的“民族國家”，儘管它的形成歷史和演變路徑與“經典的”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與路徑迥然不同。正是在國際形勢（反抗殖民主義入侵、反對帝國主義瓜分）的逼迫和促動下，中國和印度逐步凝聚內部的政治與文化認同，曲折坎坷地從傳統的古國演變成現代“民族國家”。仔細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有助於我們看清亞洲國家的歷史發展態勢。

## 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民族問題時的主要關注

### 1、當時工人階級運動的鬥爭形勢和世界發展潮流

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為關注的是當時歐洲革命和工人運動的形勢，他們在研究和分析歐洲和其他地區的民族關係時，主要的出發點就是看這些民族矛盾和民族主義運動是有利還是不利於歐洲革命的國際工人運動，他們的立場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此來反對資產階級倡導的民族主義。

處在資本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和面對各自不同的外部國際政治格局，以國家為單元或者各國內部的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性質和功能是十分不同的：（1）在西歐工業化國家，不論是主流民族倡導、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民族主義，還是國內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都是反動的資產階級以“民族”分野來破壞工人運動的思想武器，那些自認為代表本“民族”的領袖人物實質上是具有反動派性質的資產階級精英。當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階級鬥爭”與“民族利益”相對比時，總是對“民族主義”持批判的態度；（2）在工人階級擁有一定力量、

但因近代列強瓜分而失去獨立地位的前歐洲國家，當民族獨立運動與工人運動結合在一起時（如波蘭、愛爾蘭），具有革命運動的進步性質；如這些民族主義運動受到帝國主義勢力操縱（捷克、克羅地亞），有助於帝國主義擴張勢力，在歐洲革命分化時站在“反革命陣營”中，則具有反動的性質；（3）在亞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當地的民族精英雖然代表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但是因為具有反帝反殖的性質，可以成為歐洲無產階級團結和利用的同盟軍；（4）在多民族國家內部，各群體的民族主義具有破壞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無產階級革命、幫助本群體資產階級的反動作用。因此，無論在何種場景中，對於如何評價“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精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並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他們進行評價的主要依據必須基於工人運動的階級立場和本國的具體形勢，要看這一運動是有利於還是不利於歐洲和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目中，那些來自各國、各民族的革命運動領袖，最重要的性質應當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不是“民族精英”。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應當立場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提倡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要求各國無產階級把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利益放在自己所在民族國家、本民族的利益之上。這是馬克思主義創立者在思考無產階級革命時所提出的基本分析思路。如果有什麼人把自己民族、民族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他就絕對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最重要的原則立場，他就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正是貫穿在馬恩著作當中的對階級鬥爭和“階級性”的高度強調以及對於“民族主義”的具有分析性的批判態度，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從來沒有提出“少數民族幹部（精英）”這個概念，也沒有做任何相關的討論。

## 2、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建設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具有創新意識和人文關懷的理論家，主要

致力於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的構建與論證。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創新者，研究成果的精華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社會組織結構、基本社會矛盾的深刻、系統、深入地剖析，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核心概念，用以幫助我們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的這一社會形態的內在發展邏輯。如果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民族”問題的探討與他們對“商品”、“資本”、“剩餘價值”、“級差地租”等概念的討論相比，就遠不如後者那麼系統，分析邏輯也沒有那麼清晰。

居住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並密切關注歐洲各國工人運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著作中涉及的“民族”概念，主要指的是西歐資本主義“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的“nation”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他們也曾談及亞洲殖民地國家（中國、印度、波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指出這一運動應當得到歐洲無產階級的同情，但馬克思和恩格斯與這些民族主義運動及其領袖們並沒有直接或者間接的接觸，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鬥爭和解放運動在當時也並沒有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同時，由於他們不可能親歷任何一個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建國後的實踐，也就不可能在當時提出在共產黨掌權並消滅“階級”後如何在新社會結構中理解“民族”的意義和作用的觀點。<sup>21</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對“民族”這個核心概念提出過一個清晰的定義，也沒有對這個概念的歷史演變進行系統的分析。他們論述“民族”問題的思路首先是從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形態的發展階段來評議各“民族”的“生命力”、“同化能力”以及是“具有引領歷史進步能力”還是瀕臨“垂死”，其次再從歐洲無產階級革命中各民族參與的“陣營”來把各群體排列為“革命民族”和“反革

---

<sup>21</sup> “實事求是地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條件、也未能來得及對他們的民族理論進行整合，使其形成體系”（陳玉屏，2010：6）。

命民族”。他們強調的是各群體之間的政治平等（反對封建特權、追求共和民主）和經濟平等（反對剝削），他們提出的改變不合理現狀的方法就是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他們很少討論各民族、各群體之間的文化平等和相互尊重，很少把以共同文化和認同意識為基礎的群體（即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放到價值判斷的天平上，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必須以一些民族的文化破壞、社會解體甚至成為其他“先進民族”的同化或殖民對象為代價，同時把與之相關的“民族主義”斥之為“資產階級的器具”。對於在消滅階級之後各民族各群體之間的關係應當以什麼作為共同基礎，文化在社會發展、政治整合中有可能扮演什麼角色，他們也幾乎完全沒有討論。

那些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延續給予特別關注的人，在系統閱讀過馬恩的論述後，恐怕要感到失望。對“先進民族”以“沒有生命力的民族”為對象實施的同化，馬克思和恩格斯明顯是持讚許和支持態度的，因為他們心目中最看重的就是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和隨後的無產階級革命。他們同情被壓迫和被殖民的“落後民族”的悲慘命運，但僅此而已，他們認為這些民族的衰落和被同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代價”。他們是共產主義理論的創立者和政治運動的評議人，是許多革命組織的精神導師，但他們從來沒有直接領導一場政治運動，也沒有親身參與社會革命的具體實踐，所以他們對民族壓迫和殖民主義對“落後民族”帶來的深重苦難比較隔膜和冷漠也有其客觀原因。

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在他們所生活的那個年代，他們是人類知識創新的先驅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帶有創新性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幫助我們認識人類社會演進的規律；但他們既然是人不是神，就不可能無所不能、十全十美，他們的著述也不可能涵蓋“絕對真理”的全部，我們需要從閱讀他們的著



述中汲取人類智慧的營養和創新點，而不是求全責備，這才是歷史、客觀的科學態度。如果我們以一種盲目崇拜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以基督徒尊崇《聖經》那樣的宗教信仰的態度來對待馬恩著作，那恰恰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批判精神。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以科學的批判精神吸收並超越之前的思想鉅人而成為新知識的開拓者，我們在閱讀馬恩著作時必須持一種反思分析、獨立思考的精神，這絲毫無損於我們在感情上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尊敬和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吸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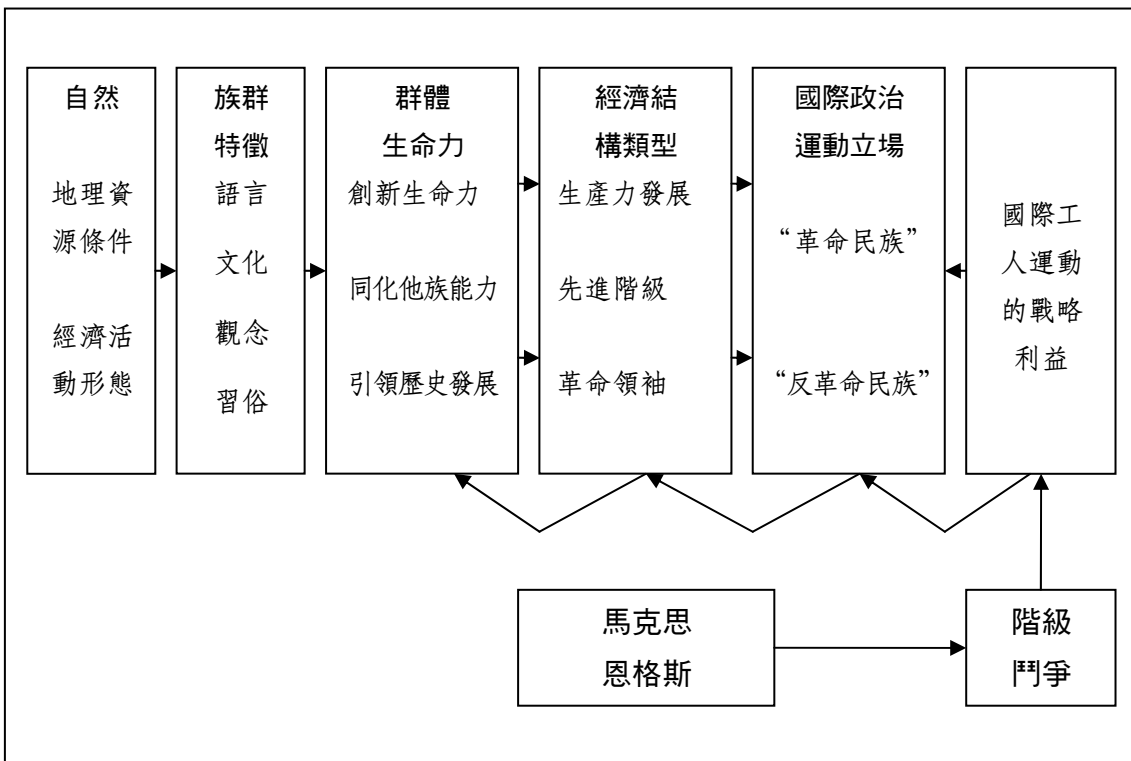
從 20 世紀共產黨國家在民族問題的歷史實踐來看，兩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很可能把“民族”的消亡進程看得過於迅捷和簡單了。《共產黨宣言》宣稱：“工人沒有祖國”，“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而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滅”（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487）。馬克思和恩格斯預言：激烈的階級矛盾將導致資本主義舊世界的迅速崩潰，解放整個人類的崇高理想很快即將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觀點和預期，無疑對蘇聯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成功後的領導人在分析和處理民族問題時所採取的策略和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我們可以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討論“民族”問題的邏輯思路作一個梳理（圖~1）。第一條線包括了五個分析模塊：（1）在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的時期，各民族發源與生活栖息地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並制約著人們的經濟活動類型（採集、狩獵、遊牧、農耕、捕魚等）和人口的規模；（2）在這樣的聚集條件下各群體發展出來各自的文化模式和社會組織形態，出現了“族群特徵”；（3）不同群體的文化模式和社會經濟形態基礎上展現出各自不同的“群體生命力”（包括知識創新能力、同化他族能力、引領歷史發展的能力）；（4）而那些最具生命力和創新能力的群體最早發明並進入“先進

的”社會發展形態（譬如進入資本主義階段）；（5）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社會動蕩時期，各群體直接或間接地介入或投身到社會革命中去，並根據各自的社會性質和利益導向分別站在“革命民族”和“反革命民族”兩個陣營裡。

第二條線是革命者的主觀分析與判定：（1）從階級鬥爭這個社會發展的主線和基本立場出發，革命者可以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來分析“國際工人運動的戰略利益”；（2）根據這一戰略利益來判斷各個民族主義運動的性質，判定某個群體應當屬於“革命民族”還是屬於“反革命民族”；（3）在解釋這一“站隊”原因時，關注各群體的“經濟結構類型”和“群體生命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範圍大致到此為止，其實還可以繼續向前追溯到族群的文化特徵和認同意識在族群發展過程中的深層次的作用。

圖~1：馬克思和恩格斯討論“民族”問題的邏輯思路



## 七、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族”的論述對我們的啟示

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距離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寫作的年代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是作為 19 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仍然可以給我們提供理解和分析歷史上和現實社會中“民族”問題的理論思路和政治智慧。

### 1、階級與民族的關係

(1) 在具體的社會場景中，“民族”本身有可能成為最重要的利益群體的身份，其感召力甚至超過“階級”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人群由於在政治結構（等級社會）和經濟結構（所有制）中具有相同的身份和基本經濟利益而形成“階級”，並在群體博弈中表現為“階級鬥爭”。在 19 世紀的西歐資本主義較發達國家，階級的界限和各自利益的衝突十分清晰。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和印度這些自身並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萌芽、而是在外力的衝擊下才被迫引入某些資本主義因素的傳統國家，階級的分化與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必然是交織在一起的。

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屠殺和奴役的鬥爭中，“落後國家”的全體國民事實上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上海租界公園的告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針對的是全體中國人。日軍在南京城實施大屠殺時，並不顧及虐殺和強姦的中國人當中誰是資本家、誰是貧民。在這樣的場景下，“民族主義”不僅不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思想工具，反而成為“落後民族”全民團結、救亡圖存、維護基本人權的神聖旗幟。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民族主義運動始終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在日本侵略東北並企圖滅亡中國的關係到民族存亡的歷史關頭，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和共產黨“建立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在中國各階層民衆中得到完全不同的反應，正是“民族主義”的情感決定了人心向背和國共兩

黨競爭中各自的群眾基礎。

所以，我們在理解和應用馬克思關於“民族主義”的觀點時，必須考慮實際國情和社會具體場景而不能簡單套用。

### （2）帝國主義的侵略推動了東方傳統帝國的內部整合

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亞洲一些內部統轄體制相對鬆散的文明古國（如中國和印度）是在外部強敵的壓迫下加強了內部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整合進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討論中國和印度時，是把中國、印度各自作為獨立的政治單元來分析的，這反映出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印兩國的整體印象。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鬥爭歷程中，中國和印度全國各階層、各族群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這兩個傳統文明古國同時接受了西方“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理念，正是外力的壓迫和現代“民族主義”的認同理念的出現和普及促成了中國、印度這兩個非歐洲的“民族國家”的誕生。這就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以“中華民族”為政治單元建立國家符合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歷程。

在清朝末年和中華民國時期，在國外勢力的催生和支持下，一些地方群體也出現了民族主義獨立思潮和運動。這些民族分裂運動衝擊了保守停滯的清王朝及舊中國政府，但是同時又幫助西方帝國主義獲取在華利益、鞏固列強對本國無產階級的統治和壓迫，從國際工人運動的根本利益考慮具有無可置疑的反動性。在一些邊疆地區甚至出現了帝國主義支持下的民族傀儡政權，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這些民族主義分裂運動加重了中國各族民衆的苦難，在道義上必須加以譴責。同時，民族分裂運動與帝國主義侵略一樣，也喚醒了中國各族知識分子和廣大民衆的現代“民族”和“國家”意識。20世紀的抗日戰爭成為中華民族進行政治整合的重要歷史階段，對於中華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意識逐步滲透到基層農村和偏遠的邊疆地區。

### （3）階級的形成和階級矛盾的顯現有一個歷史過程，“民族矛

盾”不等同於階級鬥爭

在沒有帝國主義侵略的形勢下，中國社會內部自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在實行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時，共產黨和各族貧苦農民屬於一個階級集團，國民黨和各族封建領主、土司、王爺、巴依屬於另外一個階級集團，從理論上講，當時中國內部的“民族差異”應當從屬於“階級利益”。但是在一些內部階級分化並不明顯、階級矛盾並不突出的少數民族群體（如青海藏區的一些遊牧部落、雲南山區的傳統村社），土改工作隊開展的“發動貧下中農，鬥爭反動上層”的工作並不順利，一些群眾甚至可能跟著本族土司頭人參加“叛亂”。而國民黨殘餘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自然要利用“民族主義”來煽動這些少數民族反對“漢人”共產黨。如果我們不去深入分析當地少數民族的社會結構和階級分化狀況，頭腦裡只有“階級鬥爭”這根弦，簡單地把反對“土改”的人統統當成“階級敵人”實行武力鎮壓，那恰恰是幫助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狹隘的民族情緒有可能被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用來作為分化革命隊伍、離間無產階級政黨及其同盟軍之間的合作關係的工具，但是我們不能說“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即使加上前提條件是“在階級社會裡”（陳玉屏，2010：87~88），這一命題仍然需要加以斟酌。<sup>22</sup>

（4）避免“民族”（族群）與社會“階層”的身份分野出現重合  
經典的“階級”定義與生產資料的佔有聯繫在一起，從而與剝削、被剝削的勞動關係聯繫在一起。在共產黨取得政權、通過土地革命和公有化消滅了剝削階級後，中國社會內部矛盾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1949年以前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這樣的階級分野被消滅

---

<sup>22</sup> 1980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評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之後的討論則集中在是否有限定詞“在階級社會裡”以及1958年中國是否屬於“階級社會”的問題上（參見陳玉屏，2010：88~91）。

了幾十年以後，中國社會已經不存在傳統概念中的“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而是隨著改革開放出現了私人企業和新的僱傭關係，這使中國的社會結構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社會結構開始趨同。在分析現代工業化國家的社會結構時，社會學家經常使用的概念是“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sup>23</sup> 社會成員和勞動者根據自己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社會資源分別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

這時維繫社會內部和諧所最需要關注的，就是要避免在僱傭關係和資源分配的過程中，使以文化及群體認同為基礎的“民族（族群）身份”與在經濟機構中的“社會階層身份”（被僱傭勞動者、個體雇主或公司集團等）出現某種重合，因為這種重合有可能使經濟結構中的“階級矛盾”藉由“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也是美國政府和主流社會非常關注“族群分層”（ethnic stratification）研究的主要原因。假如黑人的大多數屬於社會階級結構底層的收入最低的群體，而白人的大多數屬於結構的頂層，那麼窮人與富人的階級矛盾就會以黑人反對白人的種族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一些少數民族的母語教育體系保護了母語的傳承，但是這一教育體系對少數民族學生掌握社會勞動力市場就業所要求的對全國通用交流語言（漢語）的能力不可避免地有負面作用，在客觀上妨礙了少數民族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使他們很難進入以社會主流人群為交流對象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不但難以進入沿海和中部的廣闊的就業市場，由於經濟活動和市場銷售的全國化，即使在他們本族聚居區的就業市場上也面臨著來自漢族地區勞動者的激烈競爭。語言學習的區隔在客觀上由於勞動力市場的作用轉變為就業市場

---

<sup>23</sup> 在造成社會階層差異的因素當中，除了傳統的生產資料佔有以及“收入與財富”、“權力”和“聲望”等因素外，個人受教育因素和社會網絡（社會資本）也直接影響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發展機會，在西方社會學理論中，“階級”只是常見的分層類型之一（波普諾，1999：249）。

的區隔，再轉變為社會階層的分野。在西部各城市，假如外來漢族勞動者明顯地要比本地少數民族勞動者更容易就業、更容易進入管理層和獲得高收入，那麼這裡就開始出現“民族”與“階層”身份分野的重合。這種格局很容易使少數民族群體認為本“民族”受到整體性制度或政策歧視，從而使就業競爭帶有“民族矛盾”的色彩。這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必須極力避免的。我們可以通過大量的社會調查來確認目前“族群分層”的發展狀態與趨勢，建議政府的教育部門和勞動部門通過各種制度和政策調整來逐步扭轉這一趨勢，並最終改善少數民族勞動者的劣勢地位，使他們獲得與漢族勞動者同樣的競爭能力、同樣的就業機會和同樣的發展空間。

## 2、中華民族和內部各群體的“生命力”

(1) 各民族的“生命力”和獲得政治獨立的能力處在動態變化之中

傳統多部族帝國的“民族”(people)受到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衝擊後將向“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演化，會出現“nation”和“nationalities”兩個層面的“民族”範疇。按照恩格斯的觀點，那些“沒有具備為獨立和維持生命力所必需的歷史、地理、政治和工業的條件。那些從來沒有自己的歷史，從達到文明發展的最初階段即最低階段的時候起就陷於異族統治之下，或者只是由於異族的壓迫才被提高到文明發展的最初階段的民族，是沒有生命力的，是永遠也不可能獲得什麼獨立的”(恩格斯，1849：327)。

當然，歷史的發展在某些條件下也可能會離開人們預測的“常軌”。按照恩格斯的觀點，沙皇俄國下屬的各民族長期被俄羅斯人統治和同化，是沒有生命力的，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的政治改革中，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政治獨立，南斯拉夫各共和國也是如此。這就說明世界上並沒有先知，只有預測。歷史的發展可能並不符合恩格斯的結論，但是恩格斯分析這些“民族”是否具有“生命力”

的思路仍然值得我們思考，可以幫助我們預測這些新獨立國家的發展態勢。

（2）如何界定“民族”成為傳統國家轉型過程中如何構建“民族國家”的關鍵

“民族自決權”是自歐洲“民族”概念出現後已經成為廣泛接受的基本人權。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許多國家，內部都包括了各種具有不同文化、血緣和認同體系的群體，所以，如何界定“民族”的劃分就成為這些國家“民族構建”和內部政治、文化整合的一個關鍵。承認這些群體為“民族”（nation 或 nationality），就在道義和法律上潛在地承認它們具有政治獨立的權利。因此，那些國內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種族背景和認同意識的新型共和制國家，出於預防各群體的分離傾向和國家分裂的風險，普遍傾向於把國內的這些群體認定為“族群”（ethnic groups）而不是“民族”（nation 或 nationality），同時以平等的公民權為槓桿來妥善處理各群體之間的文化隔閡和利益衝突，這已經成為大多數西方國家處理內部群體關係的基本思路。

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時期，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佔據社會和學術界主流的思路是堅持“中華民族是一個”（顧頡剛，1939）。應當說，這個思路與大多數西方國家處理內部群體關係的思路是一致的。新中國正式“識別”和認定了56個“民族”，各“民族”的各種權利也就必然要提到國家行政體系和法律的高度來解決。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有了60多年的實踐，許多方面的實際效果和發展趨勢需要我們認真加以總結。

（3）中華民族的“生命力”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幾千年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充分展示出中原王朝的生命力和對周邊群體的同化能力，但是在清朝後期表現出保守和停滯的發展態勢。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任何比較都是相對的，晚清中國的



“生命力”確實比不上英國、法國以及後興起的日本，但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民的聰明才智完全可以在新的制度下獲得再生。中國人並不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討論 19 世紀歐洲的民族問題時，明確表示許多“民族”在社會發展的最新進程中是沒有政治獨立權利和能力的。當然，今人可以不同意他們的結論。但是，他們講出了一個在 19 世紀人所共知的事實，那就是“誰落後誰就要慘遭淘汰”。為了不至淪落到被外族欺侮、瓜分、奴役的境地，每個民族只能拼命發奮來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用實力證明自己具有在現代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生命力”。

斯大林在帝國主義封鎖中提出“知識就是力量”，“落後就要挨打”；鄧小平在實行改革開放中一再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都講得一針見血。如果不是在 20 世紀 30 年代通過經濟國有化和各種強制手段使蘇聯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化國家，<sup>24</sup> 蘇聯是抵擋不住納粹德國的軍事進攻的。當中蘇邊境衝突日趨緊張的 70 年代，蘇聯領導集團內部曾經激烈辯論是否要對中國核基地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正是由於當時中國剛剛實驗成功了可攜帶核彈頭的導彈，無人敢擔保在第一次打擊後將完全摧毀中國的核反擊能力，因此蘇聯領導集團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中蘇兩國都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在這裡我們絲毫也看不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倡導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影子。在民族國家利益的重大衝突中，意識形態因素只能退居其次。這些事件充分顯示出在國家之間的殘酷競爭中，任何民族國家必須全力發展本國的教育體系、科技事業、經濟軍事實力，提高國民的素質和創新能力，惟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使自己淪為“落後民族”而成為“先進民族”的附庸和犧

---

<sup>24</sup> 毫無疑問，這種中央集權式發展模式（農業集體化、“工農業剪刀差”和資源開發）曾使蘇聯農民和社會各階層蒙受了重大苦難。

牲品。

與此同時，我國國內的各少數民族群體也需要思考一下本族的“生命力”處於怎樣一個水平和發展趨勢。評價生命力的標準包括：通過教育體系學習國內和世界先進知識的能力，與其他群體交往中的影響力，對自身和國家發展歷史的引領能力。如果發現本群體的狀況不盡理想，在知識學習、科技活動和發展經濟等方面尚處在被動的地位，與漢族的發展競爭力的距離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那麼各族知識精英們就需要認真考慮未來本族群的發展前景並調整思路了。當然，各少數民族的發展，少數民族知識分子隊伍和勞動力素質的發展也需要中國主流社會的關心，因為中華民族整體的競爭力和生命力是由 56 個民族的 13 億人共同組成的。“水桶原理”告訴我們，正是一塊最短的桶板決定了水桶的載水量，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任何一塊桶板的散落將使整桶的水全部流光。

#### （4）國內少數族群平等的生存權和文化權

各個群體的發展歷史、生存環境和長期繼承下來的經濟活動模式各不相同，一個人把十個手指伸出來，也不可能一般齊。這就是自然界的發展規律。我們不能用同一把尺子來衡量所有的手指，根據長短來評價各自的價值，因為每個手指的功能各不相同，有時完全不能相互替代。在青藏高原的生存與適應能力，漢族明顯不如藏族。草原畜牧業的管理經驗，漢族明顯不如蒙古族。與穆斯林國家開展文化和商貿交流，漢族也不如維吾爾族。十個手指的功能是互相補充的，中國各民族各自的長處也是互相補充的，所以我們需要學會和培養各族之間相互欣賞、相互尊重的思維方式和交往態度。費孝通先生曾經說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1993：165）。這四句話，可以說是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最高境界。“各美其美”是說每個群體要保持對本族特徵的自尊，不要“妄自菲薄、自慚形穢”，要懂得欣賞自身的長處；“美人之美”是說在與其他族群交往時需

要從內心看到他族的長處，從內心羨慕和欣賞這些長處；“美美與共”是說當所有的群體都既有自尊又真正會欣賞彼此的長處時，各自的長處就會在交往和合作中彼此交織並獲得最佳的結果，“一加一大於二”；最後達到“天下大同”，建立起一個互敬、平等、公正、合作的和諧社會。

我們不僅要尊重所有群體、所有個人的生存權，還要尊重各自文化的發展權。在一些可以相互比較的方面，我們可以通過友好競爭來彼此促進；在一些不可比的方面，我們就要各自發揚各自特長，相互補充與合作。世界是一個文化多樣性的世界，中國也是一個文化多樣性的中國。在國家發展進程中，我們需要處理好各族群學習母語和學習“國內通用語”之間的關係，這樣既可以全面繼承中華各族文化的寶貴遺產，又能夠使各族民衆積極參與到國家的現代化事業之中。同時，各族民衆的認同體系也將會逐步從傳統的“部族社會”過渡到現代的“公民國家”（格羅斯，2003：7），每個公民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權利看作是公民權利的組成部分，同時建立起對中華民族和中國的堅定的政治認同。

#### （5）所有民族和族群在未來必將面臨越來越殘酷的生存競爭

全世界人口規模已經超過了70億，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源、商品市場的迅速發展，我們發現人類追求現代化生活水平的物質要求越來越高，同時地球為滿足這些需求可提供的資源越來越匱乏，甚至連無污染淡水和清潔的空氣都已經成為一些國家的稀缺資源。二百多年前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對於人類生存資源匱乏的擔憂並不是“杞人憂天”。不用多久，地球將無法提供全體人類生存和發展經濟的物資需求，那時各國之間、各國內部各族群之間的資源分配在很大程度取決於各自的競爭實力，也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各民族的“生命力”。同時我們必須承認，從幾千年人類歷史發展來看，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傳統使得他們的“生命力”水平和競爭能力（至少在科技創

新和物質生產方面)存在事實上的顯著差異,它們在現代化道路上的發展是不同步的。從地球有限資源的角度來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似乎將是遙不可及,在資源激烈競爭的現實中,必然會有一些民族和群體因競爭力不強而居於劣勢,在群體互動和文化交流中逐漸消亡或者被同化,這將完全不以人的主觀意志和美好願望為轉移,而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回到“文化相對論”,在近代人類社會的客觀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一些在競爭中居於絕對弱勢的群體(如北美印地安人部落)的傳統文化是否能夠獲得承認、重視並留存下來,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這些群體自身的努力,而取決於強勢群體(如美國主流社會)對弱勢群體傳統文化的認知和採取的具體措施,這些弱勢群體本身對此通常是無能為力的。因此,不管人們在感情上接受與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正是通過對“生命力”的強弱來論證不同文化“進步性”的比較規則和預測群體的未來前景的。在150年後重讀恩格斯的這些論述可以提醒我們,作為工業化的後來者,我們今天與工業化強國打交道時,還是不能過於天真,不要忘了幾百年來“弱肉強食”始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遊戲規則。同時,少數族群的社會精英和知識分子們也需要對本群體的競爭優勢和劣勢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在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偏重於對生產力和經濟形態的關注與比較。在21世紀,在發展生產力和發展經濟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對多元文化發展和民衆心理感情給予更多的關注。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民族”和“民族主義”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我們要善於學習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偉大思想家的智慧和洞見,同時我們也需要與時俱進,面對現實,思考和解決好我們當前面對的各種實際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年前寫下的著述,必然具有歷史局限性。今天英國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已經完全不再是恩格

斯在 1845 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描繪的情景。也正因此如此，如果我們今天仍然採用教條主義的態度逐句逐字地套用他們的著述，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必然脫離實際。恩格斯 1890 年給拉法格的信中曾這樣寫道：“所有這些先生都在搞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1890：446）。

## 參考文獻：

埃里·凱杜里，2002，《民族主義》，張明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陳玉屏，2010，〈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及其中國化問題的認識與思考〉（未公開研究報告）。

戴維·波普諾，1999，《社會學》（第十版），李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恩格斯，1848a，“德國的對外政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77~179 頁。

恩格斯，1848b，“法蘭克福關於波蘭問題的辯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71~414 頁。

恩格斯，1849a，“匈牙利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3~207 頁。

恩格斯，1849b，“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22~342 頁。

恩格斯，1851，“恩格斯致馬克思”（1851 年 5 月 23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83~287 頁。

恩格斯，1852，“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115 頁。

恩格斯，1853，“在土耳其的真正爭論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19頁。

恩格斯，1857a，“英人對華的新遠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6~191頁。

恩格斯，1857b，“波斯和中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234頁。

恩格斯，1866，“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麼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0~183頁。

恩格斯，1874，“流亡者文獻 — 波蘭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578頁。

恩格斯，1882，“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斯坦”（1882年2月22、2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69~280頁。

恩格斯，1890，“致保爾·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6~448頁。

恩格斯，1892，“《共產黨宣言》1892年波蘭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9~330頁。

恩格斯，189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爾格”（1894年11月10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2~297頁。

菲利克斯·格羅斯，2003，《公民與國家：民族、部族和族屬身份》，王建娥、魏強譯，北京：新華出版社。

費孝通，1989，“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第1~19頁。

費孝通，1993，“再談人的研究在中國”，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編《東亞社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61~165頁。

弗·梅林，1956，《馬克思傳》，羅稷南譯，北京：三聯書店。

顧頡剛，1939，“中華民族是一個”，《顧頡剛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郝瑞（Stevan Harrell），2010，“‘民族’概念翻譯中的難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7月22日第5版。

列寧，1913，“拉脫維亞邊區社會民主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綱領草案”，

《列寧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94~103 頁。

列寧，1914，“卡爾·馬克思”，《列寧全集》第 2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5~72 頁。

馬克思，1853a，“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09~116 頁。

馬克思，1853b，“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43~150 頁。

馬克思，1853c，“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46~252 頁。

馬克思，1853d，“東印度公司，它的歷史與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67~176 頁。

馬克思，1857，“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75~178 頁。

馬克思，1858a，“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84~587 頁。

馬克思，1858b，“馬克思致恩格斯”（1858 年 10 月 8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6~349 頁。

馬克思，1867，《資本論》第 1 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984 頁。

馬克思，1869，“馬克思致恩格斯”（1869 年 12 月 10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96~400 頁。

馬克思，1870，“馬克思致齊格弗里特·邁耶爾和奧古斯特·福格特”（1870 年 4 月 9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651~658 頁。

馬克思，1871a，“致《人民國家報》編輯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14~316 頁。

馬克思，1871b，“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31~389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1844，“神聖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268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640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1847，“論波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9~412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a：“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1~504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b：“論波蘭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4~541頁。

塞繆爾·亨廷頓，1999，《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

王希恩，2001，“也談在我國民族問題上的‘反思’和‘實事求是’——與馬戎教授的幾點商榷”，《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第1~17頁。

Connor, Walker 1985,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Milt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ucker, Robert C. ed.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